

# 党政干部参考

2018年7月上

第13期 (总第277期)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总编辑/社长 戴小明  
常务副总编辑 阎荣舟  
刊名题字 刘俊宝  
本期责编 赵慧  
责任校对 王秀丽

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印刷 北京强华印刷厂

## 目次

### 要论

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3)

### 本期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与未来 ..... 刘建飞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 ..... 李德顺 (6)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 赵可金 赵远 (8)  
哲学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邱耕田 (10)

### 哲学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 王南湜 (12)  
哈贝马斯的技术统治论批判 ..... 刘光斌 (14)  
庄子语言哲学的翻译学意义 ..... 朱舒然 (16)

### 政治

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 张太原 (17)  
永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 ..... 杨海英 (19)  
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 ..... 张建君 (21)  
中国政治精英优势与现代化建设 ..... 吴忠民 贾双跃 (23)

### 经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 王东京 (25)  
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张占斌 戚克维 (27)  
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认识 ..... 杨东方 (2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免八个误区 ..... 陈文胜 (30)

### 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 冯鹏志 (32)  
从《尚书》中探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源形 ..... 吴灿新 (34)  
让诵读艺术扎根于广大群众 ..... 项建新 (36)

### 社会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 袁方 (37)

# 党政干部参考

2018年7月上

第13期 (总第277期)

排名不能覆盖大学全部发展目标 ..... 张端鸿 (38)

保障和改善民生亟须高质量推进 ..... 唐莹瑞 王艳杰 (39)

## 生态

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不均衡” ..... 张孝德 (41)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 杨永芳 (43)

## 党建

适应新时代新挑战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 祝灵君 (44)

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现实逻辑 ..... 代江波 (46)

党员干部“体验式”调研的原则、方法与关键 ..... 王志航 (48)

## 科技视野

台风缘何此时频频光顾 ..... (49)

## 健康之友

燕窝的“营养”不值得追捧 ..... 王佳 (51)

· 延伸阅读 · 燕窝是怎么形成的 ..... (52)

## 信息窗

我国首次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 ..... (53)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 ..... (53)

国企工资改革2019年将全面实施 ..... (53)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加速提升 ..... (5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 ..... (54)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扩大 ..... (55)

5G全球统一标准出炉 ..... (55)

流量漫游费7月1日起取消 ..... (55)

## 最新书摘

马克思的早年岁月 ..... (56)

## 撷英咀华

胡同里的乡愁 ..... 李予阳 (封二)

##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62805451

电子邮箱 cankaocps@126.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301号

零售价: 20.00元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0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不断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习近平指出，对外工作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加强谋篇布局，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未来5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其中有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对外工作要以此为坐标，通盘考虑，梯次推进，既整体布局又突出重点，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发挥综合积极效应。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

（摘自2018年6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与未来

刘建飞

## 地球村：人类已经命运与共

共同体就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范围，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家庭、政党、社团、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企业、机关、学校等，只要是由个体所结成的集体，就可以算作共同体。不过，直到全球化开启之前，还没有出现囊括整个人类的共同体。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整个世界在经济层面都联系在一起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可以说，这时的人类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单一层面的利益共同体是十分脆弱的，会因为国家之间在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解体，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个利益共同体就不复存在。

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比如核灾难，如果说常规战争的结果通常都是有输有赢的零和博弈的话，那么核战争就是两败俱亡的负和博弈，甚至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人们也会遭到毁灭。再比如气候变化，如果任由气候变暖，人类很可能遭遇难以承受的灭顶之灾。在这些面向整个人类的灾难面前，主权国家的利益已经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主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整个人类，不管何国何族，恐怕是欲存俱存、欲亡俱亡。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人类已经命运与共，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

然的事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用了“地球村”这个词来形容当今人类社会的状况，而地球村正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虽然“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与利益共同体相比，命运共同体已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共同命运已经远远超越共同利益，它是不可交换的，共同体内的成员已经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当然，共同命运肯定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特别是那些涉及人类及其唯一家园地球之生死存亡的利益，本身就已经是不可交换的特殊利益了。

## 大家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固基强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但却是基础不牢、十分脆弱。正如同一个村庄中的有些村民之间会有仇恨，甚至势不两立，乃至发生暴力冲突一样，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价值对立，这种对立与冲突，往往导致国家之间的对抗乃至战争，最终是两败俱伤，共同衰落，至少是难以携手应对那些共同的挑战。如果任由这些对立与冲突滋生、膨胀，人类很有可能因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恶斗而遭受噩运，并使这个共同体瓦解。特别是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如果各国都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过分看重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而忽视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和整体利益，那么不仅现存的命运

共同体不复存在，而且人类极有可能走向共同毁灭。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建设这个命运共同体，使之不断巩固、强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演讲中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并用“大家庭”来形容之。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努力方向，是应然的。同地球村相比较，虽然也存在着利益分歧，但是大家庭里成员之间已经没有仇恨。任何一个成员遭受灾难，其他成员都会感到痛苦，都愿意伸出援手；任何一个成员有了好事，其他成员都会高兴，都愿意分享快乐。每位成员不管能力大小如何，个人偏好怎样，都由衷地希望大家家庭兴旺发达，都愿意为之贡献力量。

## 继往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如果不从现实出发，就很难凝聚共识，就不可能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意志。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现实之一就是，主权国家是最有权威和能力的政治实体，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脱离国家自身的建设、治理，更离不开国家之间的合作。国家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各种差异和利益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是要消灭这些差异和分歧，而是在承认这些差异和分歧的前提下，突出人类的共性和整体性，求同存异，实现共同体内个体与集体的有机统一。

当今人类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现实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些国际合作机制，它们在抑制国际冲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建设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比如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它们所关注的问题许多都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核不扩散、抑制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关乎人类福祉，同时也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影响共同发展问题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机制也功不可没。那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虽然只是关注本地区的事务，但是其功能和作用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充分发挥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

当然，现有的国际体系存在诸多弊端，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冷战思维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逆的思维、理念乃至行为方式还大行其道。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经常将这些国际合作机制视之为维护本国霸权、谋取本国利益的平台。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现有的许多国际合作机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应当根据现实需要和条件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

在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上，“一带一路”是一大亮点。“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理念上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相符。“一带一路”不追求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而是根据相关国家的需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和多元合作平台，完全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应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既要体现在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共同价值上，也要体现在不断探索、推动、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上，更要体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从而为世界各国树立实现国家善治的榜样。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摘自2018年6月11日《学习时报》）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

李德顺

## “共同体”与社会主体结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人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三个层次的主体性范畴。对其中每一个范畴的理解，都有广狭、深浅、偏正之分。

“人类”，事实上是一个存在于地球上的特殊生命物种。人之不同于野兽等其他生命的特殊之处，在于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物。人以自己特有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显示了人之为“类”的本性。从区别于自然物的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在通常以个体和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着的人们中间，“类”这种共同体的形态和意义，往往并不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反而在很多情况下被分解和遮蔽着。所以，当“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意识到时，就标志着人作为“类主体”成员的身份，开始被觉察，开始走向自觉。但这本身主要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性，而不是出于一厢情愿或一时灵感。

“共同体”，是许多个人组合在一起构成的现实社会行为主体，即一定社会权利和责任的担当者。理解共同体，不在于理解它是由数量多少的哪些个人所构成，而在于这些个人由于什么样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纽带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血缘和地域，生产的分工合作，经济利益（交换）关系，宗教信仰和政治党派，乃至个人兴趣爱好，等等。社会上的共同体各式各样，依其纽带的性质和强度，共同体也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和面貌。比如有的真实有的虚假，有的紧密有的松散，有的长久有的短暂，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等等。而联系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纽带”本身，则是构成这个共同体实质的或者标志性的因素。

“命运共同体”，是指以共同的“命运”为纽带

的社会共同体。一般说来，因生存条件和基本利益相一致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最自然、最真切、最密实、最稳定的共同体。因为“命运”不是一般的联系，而是与性命相关的联系。“命运”就是在生命、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彼此存续攸关、祸福所在、生死系之的过程。人们之间有了这样的联系，就有了一种共同的处境、共同的立场、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实践目标，遂成“命运共同体”。

确立“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社会行为的主体结构和状态。所谓“主体”，即一定认识和实践行为的行为者，用比较现实的语言来说，就是权力和责任的担当者。在现实社会中，人的主体形态是有结构有层次的，是多元多样的。每一个层面的共同体，都是人的主体结构的一个层面、一种形态，也都可以是一定行为的主体。确切说，一个社会共同体就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体。

对于社会上现实的主体结构，可以从“纵”和“横”两个方面理解：

从纵向看，主体结构是多层次的：个人是主体的最小的单位，逐层往上有很多扩大的主体，如家庭、企业和单位、地区、阶层或阶级、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地球上一个时期的全体人类、无限发展着的整个人类（历史地看，我们的先人和后代都是这一无限整体的成员）……

从横向看，现实的各层主体是多元的。当然，最高层次上的“人类”，目前只有一个（至少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别的“人类”），是这个层次上的唯一主体；除此以外，往下每个层次的主体，如国家、民族、阶级或阶层，其他小的共同体，直到个人，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单一的。世界上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企业行业、个人等，都是多个多元的。多元之间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既有对立

又有统一，有些甚至既相依存又相对抗。

就是说，在纵横两个方向上，“人”的现实存在形态，依据人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所形成的主体形态，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化、简单化的。人的不同层次存在形态之间，如国家与民族、社会与个人之间，一般来说是相互区别而不是对抗的关系，是彼此兼容而不是替代的关系。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特有的内在一致性为纽带所形成的共同体。虽然它是最具有人类整体性的主体形态，但在现实的多元多层主体结构中，它仍属于一个特定的主体。在哲学上，我们叫它“类主体”。

“类主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一般主体”或“主体一般”，它也是一个具体的特殊（相比而言，“主体”是更具有抽象一般性的概念）。就是说，“人类”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的主体，但它也是一种具体的主体。“类主体”与其他层次的主体（个人、群体等）之间，不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是特殊与特殊、具体与具体的关系。就像企事业单位“法人”与员工个人、“家庭”与家庭成员个人之间，并不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是特殊与特殊、具体与具体的关系一样。虽然“人类”是最高层位的主体，却并不是唯一的主体。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不可以认为，“人类”像神或上帝一样，是高高在上、要求所有人都只是从属和服从于它的某个“终极主体”。这里只是说，“人类”在一定情况下更像一个“最大团队”，它也是个现实的、具体的主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表现为，这个共同体也有其特定的存在和显现特征，有其特定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并且在独立、平等的多元主体之间，与其他各层主体保持区别而不分离、差异而不对抗，兼容而不替代的关系。

一般说来，在面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整体性危机的时候，最容易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比如在环境生态问题上，举世公认的环保立场

和协同行动，就最能够直观地显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全人类共同一致的立场、利益和态度，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语境中的呈现方式。大家都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以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来面对环境问题，就是人类主体的到场和显现。相反，如果某些国家和地区，只是追求自己利用环境所得到的好处，却拒绝担当相应的环保义务，尽管它们也可能有必要的理由，这理由也只是站在个体主体的立场，而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是力求兼顾个体的需要与整体的需要，个体之间有差别地分担共同的责任。否则，仅仅以个体间的分离和孤立为前提，是不可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共同的生活条件和共同价值尺度，是连结共同体的纽带，而共同的价值观念则是共同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和思想基础。客观上，人和人之间一旦形成了共同体，就意味着有了共同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尺度。主观上，人们就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遵守它，实现它。这样就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价值观念是指共同体所需要、也能够在共同体成员之间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但它与共同体内每个成员自己的价值观念处于不同的层次，彼此也不能替代。

比如“球员——球队——球类项目——竞技体育事业——社会文化体系——人类社会生活”这个系列的层次关系。一个球员，他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有什么样的定位和追求，是他自己的价值观，与他是否加入某一球队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当他加入了一个球队，那么要使本队成为优秀的、常胜的球队，则是他和其他全体队员、教练和领队应有的价值共识；这个共同价值观念，固然使每个队员在比赛时力求充分发挥，有所作为，却不是每个队员个人价值观念的简单重复或相加。

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主体的一个层面、一种形态。这个主体与其他层次的主体之间，是一种层次性彼此兼容的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是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党政干部学刊》2018年第5期）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赵可金 赵远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毫无疑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易事，面临着众多现实挑战和艰难险阻，因此，路径选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选择正确的路径是关乎这一伟大实践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1. 外交路径论。这一观点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外交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依靠外交途径进行。因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和经济治理、国际发展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外交实践，例如中国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在他们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中国国内发展模式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转化和投射，有利于全球治理的进程，甚至会创造出新的地区和全球秩序。的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目标，但仅靠外交路径是不行的，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协同推进。

2. 发展路径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是试图寻求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一些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梦”的对外政策组成部分，目的是在保障国内稳定和发展，保障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的同时“走出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维护中国的海洋利益、应对美国同盟体系的压力。还有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欧美国国家现代性危机提出的“中国方案”，志在创建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但不能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的方案”，需要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努

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3. 综合路径论。这类观点关注宏观规划和总体布局，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系统方案。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同志提出“四路径”说，要注重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政策措施的综合性；推动建立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制度体系；各国政府要做到权责均衡，内外兼顾。在具体实践层面，学界尝试从文化层面、价值传播、战略布局和全球治理等具体层面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问题。但是，强调综合路径不是不分主次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赖于制度创新和治理之道创新，着眼于提升全球集体行动能力。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之道

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一带一路”正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道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中国道路在欧亚非和南太平洋地区范围内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它看重的是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因此，“一带一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梦”“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生活单元，核心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此种人类命运认同与多样化的国家认同、社区认同、



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等并不矛盾。因此，作为一种治理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核心的任务是发展和完善全球和地区的治理结构，打造一个涵盖了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等诸多行为体互动形成的治理体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原理表明，人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的类的属性，表现为全球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全球公民丢失了的邻里关系、社区关系、国家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恢复起来，让备受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挤压的空间活动起来，探寻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魅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的挑战面前，不是在统治逻辑和商业逻辑中展开的社会公共生活，而是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基础上展开的以关爱、互助、包容、共赢为基础的交往和治理秩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互动的网络、资源、平台和机会空间的总和，它的基本逻辑是自治和治理，是国家的权威原则、市场的效率原则和公民社会的公正原则互动过程的产物。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由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存在种种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对驱动全球化的理念进行创新。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从中国在各种场合表述的主张来看，这一倡议着力打破二元思维，确立包容思维；打破优胜劣汰、胜者全拿的霸道哲学，确立合作共赢、开放普惠的王道哲学；打破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确立利他主义的共商、共建、共享。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谋求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更是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新全球化理念，必将开辟一个全球

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层面的发展计划，它是全球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改革的“试验田”，其基本逻辑是同舟共济，风险共担，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促进全球和区域共同发展的最为合理的制度表达形式。

在中国人的理念体系中，整个世界是一个家国、天下与天命紧密连接的整体，家国情怀、天下观念和天命信仰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国家、世界三位一体，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传统和优势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推己及人、兼济天下情怀的合理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搞得好不好，全球治理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显然，中华文明关注的焦点不是不同身份之间的“权力分配”形式，而是对各种形式的安排保持了一种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努力吸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关注政治秩序的结果，不大在乎政治秩序的形式。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西方人关注霸权，中国人重视王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谋求天下长治久安、共同繁荣的美好前景。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强调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总之，作为一项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其建设路径上必须首先要突破“欧美方案”的碍难云霓，将中华文明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推动不同文明在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释放新的发展活力，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赵可金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赵远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摘自《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

# 哲学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邱耕田

##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践和意识的统一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客观和主观、实践和意识的统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一个实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现实正日益清晰地出现在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活动中。从空间上看，当人类实践活动进入到全球范围，在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浪潮推动下逐步形成了具有客观现实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客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呼唤着主观的或精神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这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基础上，自然生成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的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展变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效果是检验或衡量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起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指导作用。从世界观或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或思想可获得关于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状况或历史方位等的正确认识，从而具有认识上的“定位”功能；从价值观的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能够告诉人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是什么，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活动发挥一种价值观层面上的定向作用；从方法论的层面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还包含着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制机制、原则要求、方式方法等的内容，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发挥方法论意义上的“抓手”“栏杆”之类的作用。总之，有了实践，就应该有思想观念上的观照和反映活动，这是从实践向理论的升华；有了理论就要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更自觉、更成熟、更稳健、更有效，同时也使理论或思想获得检验和发展。

##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利益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对业已出现的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只能从“利益”的基点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人类利益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就是说，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把握与确认，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点，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珍视、维护和争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存在着一种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机制。从正面看，打个比方，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世界各个国家，

大家都坐在“地球号”这一艘“诺亚方舟”上，彼此利害相连、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从而形成了一个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换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交往的加深，不同国家或民族在利益上的关联性、交汇性、渗透性、依存性、相互保障和增益性日益凸显、增多，当今国际社会俨然是一个具有共生性、共利性、共荣性即高度整体关联性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对人类的共同利益生成和发展的一种确认与反映。从反面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自我中心主义的猖獗，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一系列的挑战或问题严重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都在严重损害着人类的整体利益，破坏着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为了克服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人类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起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积极性、能动性，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要处理好 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一个矛盾集合体。矛盾论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矛盾性，而矛盾有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当今国际社会是由不同国家实体构成的，这些国家间就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它们之间既具有差异性、斗争性，还具有共性、同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从当今世界诸多国家间共性或同一性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的把握，不仅仅强调的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从差异性、斗争性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的把握，揭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众多具有差异性甚至斗争性的国家组成的，在人类利益共同体中，就包含着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根据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分析，一方面，同一性依赖于斗争性，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甚至对立的同一。这意味着，没有众多的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国家，就不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没有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就不会形成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我们在追求或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还要照顾到不同国家利益的关切点，确保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不能打着人类利益的旗号来损害一个国家的正当权益。为此，国家在交往中，要坚持平等尊重、民主协商原则，反对或摒弃以邻为壑、武力威胁、强权独霸、弱肉强食、零和博弈之类的做法或冷战思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把特殊的自我利益凭借强权或实力无限拔高而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让其他国家的人民认可和接受。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就搞西方中心主义的那一套东西，把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视为“普世价值”而强行向世界推销。这实际上是把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的做法，是强权支撑下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斗争是同一中的斗争。这意味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形成、人类整体利益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眼里只有自我的特殊利益而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以自身特殊利益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自2018年5月28日《光明日报》）

#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王南湜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一层面的结构，而是一种双层结构，即至少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两层面划分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两个层面在社会生活总体中所占比重是有差异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由这种双层结构便可推知，基本人性的结构也必定是双层性的。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就人作为必然王国中一名成员而言，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便是“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所谓必然王国，所指的是这种物质生产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这种“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那种“真正的自由王国”。

在这一领域中，既然人所从事的只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这种“自利”的活动，则这种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也就只能是“自利”的，从而在中等匮乏条件下，人们对于财富或利益便必定会提出互相冲突的要求。而正义便正是对这种自然的不足的一种补救措施，即以某种正义原则去规范人们的生活，以使之能够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处。

以何种方式去证成这种作为补救的正义规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政治哲学史上的各家各派皆有不同的原初理论路数或基本出发点。那么，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路数或基本出发点是什么呢？从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来看，我们可以同意夏皮罗的观点，那就是马克思

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是源自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这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预设了自我所有权原则的，否则，对于资本家作为剥夺者对于工人的剥削的批判便是没有依据的。按照这一理解，如果自我所有权理论构成了对于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的前提，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便是这一理论必然是马克思理论观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也自然地构成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建构消除剥削的正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的确，如果预设了自我所有权，固然是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不同于从基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的批判，而是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来批判资产阶级，这无疑比从外部批判要有力量得多。马克思在其全部理论中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应该说是明确无误地表明他是预设了类似于洛克的劳动创造价值故劳动者应拥有全部价值的前提的，或者说，洛克的作为劳动创造所有权的权利原则在这里至少被默默地预设了。在洛克看来，一个人无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利，并由此可推导出通过自己身体的劳动而对劳动产品拥有权利的结论。显而易见，如果不预设这一原则，所谓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即对于工人权利的侵犯便无从谈起。

但是，这种接受会带来十分严重的理论后果。这是因为，一旦洛克的权利原则在马克思这里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便会带来诺齐克的问题，那就是自我所有权的承认意味着对每个人天赋能力差异的承认，从而便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于由这些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的承认。

如此一来，同一个自我所有权理论，便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又似乎可以用来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辩护。正如柯亨所指出的，马克思通过剥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状

态的设定都离不开对自我所有权原则的运用和承认，因而诺齐克从自我所有权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护事实上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更大的困扰，这种困扰远比诺齐克本身针对的平等自由主义者因此受到的困扰要大得多。

因此，要维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当性的批判，要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为平等和共享的价值维度做出正当性的辩护，就必须对诺齐克的资格权利理论给予批判式的回应，就必须对其理论的前提即自我所有权进行弱化甚至消解。但同样明显的是，柯亨的这一对自我所有权理论的弱化或消解，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其代价是太高了。因为这一消解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否定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剩余价值论和剥削理论，而剩余价值论如恩格斯所言，乃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思想成熟之唯一标志。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看，即按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无疑也是预设了洛克劳动创造权利的原则。这是因为，若无这一预设的话，按劳分配便不能说是被证明为合理、正当的分配原则；进而，也只有按照自我所有这一原则，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价值原则上才得以成立。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又明确声言，这一原则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原则之缘由。就此而言，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权利原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享有的价值原则，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按照马克思的观念，只有在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这一价值原则才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贯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原则则受到了私人所有的严重破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原则的；而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值得欲求，也正是因为它能够完全地实现这一价值原则。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从自我所有权出发去构建其理论的，但如前所述，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并非单一层面的，而是双重层面的，即一方面，

人作为现实的存在者是以生命的自我持存为首要目的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批判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认为人类存在是以自我完善为自然趋向的。因此，人类的需求不仅是满足其自然生命存活物质生活资料，而且更是自身全部潜能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独特之处是对人类实现自身能力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进行了科学的探讨，指明了理想性层面得以实现的程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获得特定程度的实现。马克思曾经设想作为人类之终极理想的自由王国及其存在的一般条件。马克思曾写道，对于自由王国的实现而言，工作日的缩短是关键，但工作日的缩短受限制于生产力发展的资源状况和消费需求的有限程度。而这两个条件在今日似乎都显示出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一致：一方面，资源的有限和环境的承受力似乎使得生产力的无限发展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基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有限从而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的设定，在当今消费社会狂潮面前似乎也难以坚持。这使得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理想似乎难以实现，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这种理想性层面都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应是没有疑义的。

这样，这一难于实现而又为人们所永恒向往的理想便尽管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目标，但仍可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理想而引导人类趋向理想社会。在现实社会中，基于自我所有权原则，我们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基于自我实现原则，我们则应该对按劳分配的后果做某种调整，以使得不平等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这与罗尔斯所引进的差别原则就效果而言是有相通之处的，但就其理论依据而言，则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只有以自我实现的目的论为预设，才能够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按需分配对按劳分配介入的合理性。基于此原则，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价值原则上得以成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学院）

（摘自《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原题《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

# 哈贝马斯的技术统治论批判

刘光斌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现代科技革命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逐渐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渗入到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各个社会领域并产生着重要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专门针对此现象，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统治论”问题。

## 技术统治论的出场

技术统治论这个术语是作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关于科技进步对社会和政治之影响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出现的。谢尔斯基、弗赖尔、盖伦和马尔库塞等人都曾参与讨论，并得出了技术的自主化及社会发展从属于技术操作的必然性的结论。这些讨论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关注，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他不仅引用了盖伦等人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而且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还毫不掩饰地谈到该书的内容就包括针对马尔库塞下述观点的辩论：“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可见，德国学界关于技术统治论的讨论构成了哈贝马斯技术统治论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

哈贝马斯指出，虽然政治的科学化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无论如何已是一种发展趋势。他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如国家委托的研究项目的范围和国家机关科学磋商的规模扩大，标志着政治科学化正在发展；现代国家是由中央财政管理同国民经济以及区域性经济的市场交易活动相联系形成的，受过法律教育的官员们同军人掌握的专业知识没有根本区别，即都是在运用技能。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国家的官员、军人和政治家在行使他们的社会职责时，严格按照科学建议来办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有的现象。他认为，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发动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科技意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一种自主性的正当化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了令人担忧的过程。

## 技术统治论的诱惑

哈贝马斯主要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角度揭示了技术统治论的诱惑。在这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针对马尔库塞“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这一观点。他不赞同马尔库塞的说法，即技术是统治的有力工具，技术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和科学成了意识形态，起着统治人的社会功能。在经济领域，技术进步造成了虚假的阶级平等关系，把人们的行为引向消费；在政治领域，“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单向度的文化，造就了失去判断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利用技术而非恐怖有效地统治着人的极权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这只不过是技术统治意识形态带来的诱惑而已。这种意识形态的诱惑相比较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新的特点。第一，旧的意识形态以不加改进的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建立在集体的压制之上，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只是人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压制而已。技术统治的意识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较少”，或者说是一种隐形意识形态。第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借助于对个人需求的补偿，保持了群众对制度的忠诚，从而更加难以抗拒。哈贝马

斯指出，“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的组织加以分离，即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的规则加以分离”，也就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并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针对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重新建立了坐标系，以此揭示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本质。他认为，应该在分析的层面上把一个社会制度的制度框架或社会生活的世界与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将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我们的行为只要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从规范上讲也受法律效力的行为期待的控制和强制；我们的行为只要由技术系统来规定，它们就同工具的行为模式相一致，人们的行为就可理解为对变换着的环境的适应性的反应。可见，制度框架是由社会规范构建的，技术系统则按照目的理性自成系统。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技术系统在其自身领域是不成问题的，而技术统治论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技术系统侵入社会制度框架中的后果，即用把自然过程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的方法来控制制度框架。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才是技术统治论带来的真正问题，技术特征并非是政治的，因此技术进步不能成为政治合理性的判断标准，统治的合理性必须在制度框架下获得规范的辩护。

### 技术统治论的前景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的主要问题是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换言之，就是没有处理好技术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而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如此一来，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便转化为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用于从事生产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

针对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主要分析了三种模式。一是决定论的模式。该种模式来自从霍布斯到韦伯的传统，其主要形式特征是专家依附于政治家，主张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同时统治的实践要求政治家关心所决定的意志的贯彻。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

是：尽管专家的专业知识能够决定合理的行政管理办法和军事安全措施，也能够迫使政治实践依据科学规则采取手段，但在具体情况下，却不能由专家做出具体的决断。按照决定论的观点，决断本身原则上避开了公众讨论，因此政治统治不可能合理化。二是技术统治论模式。这是从培根到圣西门的传统，其主要形式特征是政治家成了有科学知识的人，也是所作决定的执行人。这些有科学知识的政治家提出具体情况下可以掌握的技术、资源以及最佳战略和控制手段的必然规律性。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第一，把技术进步的内在强制归功于社会利益的自发性。第二，技术和战略不能全部解决实践问题，实际上就是决定论模式的再现。三是实用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形式特征是在专家和政治家的职能之间不做严格区分，主张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交往关系，“科学家向做出决断的行政当局提供建议，反过来，政治家们按照实际需要给科学家们交付任务”。

哈贝马斯认为，决断论和技术统治论的问题是曲解了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以失去全部民主为代价；实用主义模式虽然维系着同民主的联系，但在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缺乏有效的转换。哈贝马斯的设想是，“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按照他的意思，这样有利于启发政治活动家参照技术上的可能和可行情况，改变想当然的态度，同时政治活动家们也能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接受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发展技术知识。

哈贝马斯并非一味反对技术和科学的应用，而是反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他主张技术的应用须在自身的技术系统范围内，而不应该干预制度框架，政治的合理性的辩护标准不能来自技术而应获得人们对制度的忠诚。显然，哈贝马斯注意到科学和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技术统治论无法解决的，而把科学和技术置于技术系统内并为其发展划界，则是哈贝马斯乐见其成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2018年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庄子语言哲学的翻译学意义

朱舒然

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的途径和传播知识的载体，是“表意之具”，也是“得意之器”。笔者以为，庄子对待语言的态度可以简要总结为：承认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作用，承认语言的局限性，应不断追求对语言的内在超越。这正是哲学翻译中译者应该追求和秉承的精神。

首先，庄子从根本上肯定了语言存在的意义。“得意忘言”出自《外物》篇的著名片段：“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筌”是捕鱼的竹器，“蹄”是逮兔的工具，捕到鱼、兔后，工具自然会被暂时搁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得鱼、得兔的前提是“筌”与“蹄”的存在。“意”和“言”的关系也是如此：要“得意”，必定先有“言”，这已从根本上肯定了语言存在的意义；反之，未“得意”已弃“言”，也绝非可取之途径。进一步说，“意”是目的，“言”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达意的前提是语言作为工具要被“磨砺”到极高的水平。庄子这段话的内在逻辑表明了他的语言哲学不仅不是对语言的否定，反而是对语言的把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得意”后的“忘言”不过是对语言的暂时搁置。相似地，标志着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也曾提出，一个人的语言水平越高，他的自我意识水平才越高，对自己的思想才能有更加精细的判断。从人类学意义上来说，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石。“当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述并真正领会了自己的意图时，作为自我意识的‘我’才真正成为了焦点。”也就是说，能够反映自由意志的语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而对“意”的反映程度也取决于“言”的表述水平。

其次，庄子通过对语言的细分，详细解释了“言不尽意”的确切意义，既承认语言的能力，也

承认语言的局限性。对于“言”究竟能反映什么，庄子首先通过对“言”和“道”的本质进行分界，解释了为什么“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道”是形而上的，“言”是形而下的。他明确指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基于道“无”的本体论，他强调“道”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名无实的，是存在于“六合之外”的形而上的范畴；然而“言”是有限定范围的，即“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不会超出“六合之内”的形而下的范畴。所以在庄子看来，“夫道，然难言哉”，“言”无法反映“道”，因为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是不能被有限的“言”完整地反映的；但凡有任何缺失，失去了其完整性，“道”也就不能被称为“道”了。庄子进一步对“言”“意”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可以看出，“意”可以分为对“物之粗”的认识和对“物之精”的认识，而超越了“物之粗”“物之精”的，也就是“不期精粗”者，就到了“道”的层面。庄子肯定语言在表达粗浅认识方面的能力，但也肯定了语言在表达精细微妙的认识时的局限性，并且提出“道”是语言无法讨论、意识无法完全感知的。因此，当语言描述的对象是“有限”时，庄子是肯定其作用的；但是，庄子更加强调超出语言表述范围的、有限之外的、形而上的“道”的存在——通过对有限的“言”的追求，力争达到对“道”的无限接近——这也就是强调对语言本身的内在超越。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生）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 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张太原

毛泽东的成长经历、所受教育和所处社会环境，使他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年少时就产生了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吃上饭的朴素愿望，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决定改造中国和世界，打倒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曾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也尝试过建设“新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规划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走上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之路。毛泽东的这种初心与十九大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非常吻合，由此更加表明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不改”。

## “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毛泽东十四五岁时，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当然，读的大都是有趣的小说，就像今天中学生读课外书一样。与众不同的是，他有一天忽然想到，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什么文官、武将和书生等，没有一个种地的农民做主人公。原来，少年毛泽东在帮父亲种地的过程中，对周围的农民有了较多感知，发现一些整日劳作的人反而生活艰难，便产生了这种思考。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纳闷了两年，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他们都是人民的统治者。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在主持湘区工人运动时，更是以“劳工的生存权”相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做工的时候能生存，“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此时，毛泽东对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阶级意识。1921年11月，他在《劳工周刊》撰文提出：“劳

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他看来，“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的社会是要不得的。可以说，“大多数穷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青少年时期对穷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与成年以后对社会的观察、接受的思想学说，最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化作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大多数穷苦人民”谋“幸福”。那时毛泽东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饱饭，而就这一点对四万万人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联想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现在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强调小康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一个不能落下，与当年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何等一致！又是怎样地一脉相承！当然，今天的使命和追求在毛泽东初心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地继续前进了。

## 改造中国和世界

1921年初，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经过讨论，最终明确了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稍后，毛泽东会同何叔衡、贺

民范等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改造”的实际行动。

1920年11月，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说明，他们反复讨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改造世界诸方法”。这里所讲的“世界”，显然更主要的现实的指向乃是“中国”自身。其中提到的“诸方法”，毛泽东大都尝试过。

首先是教育。早在1917年，毛泽东在写学友会日志的时候就曾指出，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来作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1920年1月，他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给总统呈文，其中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

五四那一代青年，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毛泽东所尝试的另一条改造道路是建设“新村”。1919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撰文谈到，“改良其旧”，必须“创造其新”。他曾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

那时的中国，“个人解放”虽方兴未艾，但是“社会改造”也日益成为思想界言说的重点，汇为一种时代思潮。并且，“言改造者”，越来越趋向于“根本”一途，“须先摒弃一切腐朽，破坏这旧材料，而另择合用之新材料改造之，庶可称为根本之改造，庶其所改造者，乃可永久而不再改造”。毛泽东曾提出的“改良其旧”逐渐变为打破其旧，“不破旧社会不能得新社会”，“夫倒恶政府，不能望诸恶政府自倒，倒之之责在我民，非异人任焉”。因此，应“持坚忍的毅力，抱彻底的主张，以谋所以倒政府，使恶者改为良，破社会，使旧者化为新”。打倒旧的，建立新的，逐渐成为时代的呼声。但旧的就在眼前，而新的在哪里呢？

## 实行社会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从支持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

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遂产生浓厚兴趣，并与同学进行了讨论。这个时候，毛泽东仅仅把社会主义看作外来的新鲜事，不但不清楚它有许多流派，而且还远没有与中国自身联系起来。五四以后，在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思潮运动的激荡下，他很快发现改造社会的方法中，“有一派很激烈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的人。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他仍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1920年3月，他专门去找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谈“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明确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种迷惑当时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面对纷繁多样的“新思潮”，“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不过，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后来他谈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是年冬，“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许多人都是读了这些书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式书籍是推动近代思想变革最重要的载体。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动摇过”。

自此，以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毛泽东矢志不移的信念。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 永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

杨海英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要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有坚韧不拔奋斗到底的精神。

##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奋斗精神的政党

在9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前赴后继、奋勇前行，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靠的就是建立在坚定理想信念基石上的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义无反顾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经过28年浴血奋斗，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完成的政治任务，迎来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怎样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个历史性考题。正是在奋斗精神的凝聚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大庆油田开采、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成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大长民族志气的辉煌成就，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再一次伟大奋斗。邓小平同志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

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出来的，是伟大实践、伟大奋斗创造出来的伟大时代。

## 在奋斗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更需要接续奋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从现在到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进入倒计时，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并不平坦，还会有诸多矛盾要解决，有不少硬骨头要去啃。我们不仅要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奋斗精神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更要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上不懈奋斗。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任务更为宏大艰巨。尤其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参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是一场艰巨的社会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认识革命，只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驰而不息地奋斗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奋斗。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不懈奋斗。放眼当今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黑天鹅”频飞，世界不确定性日渐积累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如何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喧嚣中，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使其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如何在猜忌、封闭、对抗阴影潜滋暗长的氛围中，让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深入人心，化理念为行动，变愿景为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

## 践履信仰和使命担当需要中国共产党永远奋斗

不忘初心，筑牢永远奋斗的信仰之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这一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源泉。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共产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在身处低潮时不气馁不消沉，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豪迈坚毅前行，在走向辉煌时不骄傲不自满，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情怀快马加鞭，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始终不忘曾经走过的路，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牢记使命，担负起该担当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和政治家应具有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的写照。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呼唤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展现新担当。我们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我们要以忧党、忧国、忧民的情怀，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奋斗，通过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

践履信仰需要中国共产党永远奋斗，使命担当需要中国共产党永远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我们要在永远奋斗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在中国大地上不断续写崭新画卷。

（作者为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自2018年6月8日《光明日报》）

# 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

张建君

历史地看，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年至1949年，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立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独立自主寻求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全球化成为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把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 中国视野中的全球化进程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一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既有的发展轨道跌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列强瓜分和军阀混战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初，仍然不能抵挡外侮的侵略，说明国家的自主能力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一些数据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1820~19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欧洲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3倍，中国人均收入则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就是在世界人均收入增加了2.6倍的时候，中国人均收入严重负增长。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社会制度落后的问题，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指出外来殖民入侵和传统体制是尤为严重的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问题。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经过艰辛探索逐渐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作为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浪潮的反击，寻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并非某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一系列被殖民掠夺的国家，寻求自主发展道路

的结果，甚至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反抗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力量。在两种全球化力量的竞争中，团结支持自我发展的国际力量，在结合国情选择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制度框架基础上，快速夯实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实力，是这个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最大特征。中国这个时期的发展，为形成全球化纵深发展时期的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化第三阶段，即1978年至今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中国通过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期，具有中国自主走向世界的典型示范意义。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经济困顿的落后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浪潮的回应。前者注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发展作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表述，是对中国发展主题的基本框定。服务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题，中国进行了从体制改革、体制突破到体制转型三个阶段的改革探索。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自主创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从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更为紧密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全球化成为中国模式崛起的重要国际背景。

## 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因素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推动的，是比政治结盟、文化原因所形成的文化亲缘国等关系更为稳定的发展形态，凸显出经济因素是全球化更易把握的推动力量。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的开放和交融，这仍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

的重要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竞争中，政治因素虽然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是经济和技术动力发展的制度保证。经济动力借助科技力量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这种发展需要有效的制度加以约束和稳定。因此，如果能够获得全球化制度安排的提升，其本身就具有全球的号召力，也具有更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相反，一种发展模式，如果不能获得全球化发展的制度认可，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迫成为制度调整的过程，这种制度调整的参考模式就是主导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强国发展模式。在全球化制度和秩序的调整过程中所引发的观念、价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特征，因为这些范畴的内容，伴随文化和时代的差异往往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可能；但由于经济的强势往往使得主导国家的政治理念，更容易受到广泛的认同。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政治力量的协作和对抗，这些问题往往潮起潮落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今日的竞争对手可能转眼间变成了明天的贸易合作伙伴。全球化的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和长久的利益联系，使得经济、政治的因素充满了变数和很难稳定预期的发展前景。其中，文化因素是一个重要的例外，按照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来看，文化的差异是形成全球冲突的深刻根源。在他看来，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政治因素无疑是失败的全球化动力，西方社会极力宣扬的民主价值和政治观念虽然容易获得全球精英的认同，但这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现代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好的成功案例。相反，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似乎更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这显示了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和技术因素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是内在而紧密结合的推动力量，但政治因素的可行性并不与全球化主导国家的期望同步，文化因素则成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重要变量。文化是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政治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具有反映长期历史经验积累的特征，也具有民族偏好的心理、行为特点。主导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国家，尽管更为容易扩散其政治影响、文化理念；但这种政治影响和文化理念如果不利于实现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就很难获得相应的助力和支持。从长期来看，对于一种发展道路的认同，不仅仅是这种发展道路所创造的持续经济效应，同样在于这种发展道路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所能够被认同和接受的程度。

### 中国道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动力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因素。中国文化具有天下为公、崇尚礼义、以和为贵、兼容和谐的品质，自古以来就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形成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格局。经过现代化的冲击和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化具有更为超前的世界眼光和制度基础，这就为全球化和中国模式的相互促进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在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下，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成为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经过40年的平稳转型已经步入良性上升的发展轨道，这是全球的福音。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和谐邻邦、共享文明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展，就形成了独立于强国之外的均衡力量。因此，中国需要同转型国家间加强合作；保持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并提升经济合作的力度；加强金砖国家的经济协作，寻求共同发展之路；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理念，形成互助协作的发展框架等等。“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不但将给全球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福利，还会带来中国人的全球化思想与观念，而这些思想和观念将改变世界。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摘自《前线》2018年第6期）

# 中国政治精英优势与现代化建设

吴忠民 贾双跃

## 优势之一：务实的精神

第一，中国政治精英基于务实的精神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务实的精神要求理论必须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当理论与现实两者出现某种背离时，毫无疑问是理论必须服从现实，而不是相反。任何同现实脱节的理论，都不能用来指导现实的实践行为，否则，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失误。

第二，中国政治精英基于务实的精神确定了现代化建设必须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经验不足的国家。体量的巨大，使得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包含着巨量的构成要素，而各种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任何一个构成要素发生变化，都会产生一种联动的效应。于是，并非偶然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届领导人，都是无一例外地极为重视社会安全问题，甚至经常用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字眼予以强调，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中国政治精英基于务实的精神制定出现代化建设循序渐进的具体推进方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精英本着务实原则，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略来推进现代化建设。这至少表现在：一是从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边探索（而且是多方面的探索）边推进的谨慎推进方式，从而避免了由于情况不明却贸然进行大规模大幅度改革而可能造成的代价巨大的危害。二是先从农村开始突破，从而绕开了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城市，使改革避开了许多阻力。三是中国的改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而不是从社会或是政治领域寻求突破。

## 优势之二：关键时期的超强反思勇气和纠错能力

中国政治精英的超强反思勇气和纠错能力，首先来源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话，那么，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治精英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政治精英来说，没有什么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及时反思纠正自身的不足，能够有益于历史发展和进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会不顾自身的荣辱得失，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纠正偏误，推动发展。

中国政治精英的反思精神，还来源于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人民观。这种人民观，主要体现为在重大决策关口，始终能够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当工作出现一些失误，中国政治精英能够将人民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行深刻自我反思，果断纠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中国政治精英的反思精神，还来源于他们发自内心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主要表现为坚持真理，敢于挺身而出，能够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近代革命文化的熏染，中国的政治精英怀有深厚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国士”情结，拥有坚定的改革意志和强大的推进力、行动力。

## 优势之三：重视学习的传统

同别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精英相比，重视学习，

重视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文明，这是中国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的九十个春秋就是个‘学习型政党’，尽管最初没有这样明确的理念，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有的品质。”在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中国政治精英更是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的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能比得上中国政治精英如此重视学习。客观上看，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还是英国的工党、保守党，等等，均无此优势。

重视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政治精英获得一种与时俱进的能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政治精英的知识化、职业化、专业化的水准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通过学习尤其是终身学习，就能够使政治精英始终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正是来自政治精英内在的与时俱进精神。一个实际情况是，每当中国现代化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政治精英总能对其进行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和具体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向更高的阶段迈进。这种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创新，离不开学习型政党的建设。

重视学习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能够使政治精英内部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和整合。学习是中国政治精英统一思想的重要机制。通过学习，政治精英可以准确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认清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能够保证步调一致，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战略在具体执行环节不被曲解。再者，通过学习，政治精英还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沟通，形成共识，从而有助于政治精英群体的团结整合。

#### 优势之四：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所谓社会动员能力，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将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资源集中在一起，用以“强力”实现某个重要目标的能力。通常地讲，社会动员

能力就是一个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一个社会能够通过社会动员方式获取一种“常态”情形下难以出现的社会推动力量。

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相比，中国的政治精英拥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一亿人以上的大国中，中国的举国动员体制最为完备，能力最强。从组织形式来看，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甚至每一个村庄、街道，均有党政组织的存在和有效运转。

在特有国情条件下，中国政治精英所拥有的这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果运用得当，对于现代化建设将十分有利。第一，能够有效地推动基础设施、大型工程的建设。第二，能够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第三，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棘手的难题。

#### 优势之五：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所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文官政府无条件地指挥武装部队”。这样的制度设计，至少具有三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保证了中国政治精英执政的连续性。由于政治精英对军队拥有绝对领导权，保证了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最为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中国也没有发生军人干政的情形。其二，保证了文官系统正常高效的运转。一方面，中国军队严格听从党的领导，没有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精英通过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渐建立起了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其三，保证了国家应对巨大灾难的能力。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当面对“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等特大自然灾难时，中国政治精英才能够从容应对，能够调动军队有效参与救灾，并防范社会失控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贾双跃，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摘自《人文杂志》2018年第6期）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王东京

经过40年改革探索，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望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至少可以得出三条重要的基本经验。

##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 确保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40年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

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我们就能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就要带领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施行免除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民生活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城乡差距趋于缩小；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8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 坚持生产力标准，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早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坚持生产力标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依靠亿万人民的主体力量和创新精神。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崭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现实中也并没有现成经验。要胜利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人民群众进行开创性探索才能取得成功。无论是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搞活国有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是建设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等，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重视群众切身利益。及时总结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尊重群众意愿，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高度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呈现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 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 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40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把改革作为动力，把发展作为目的，把稳定作为前提，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他指出，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

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才能通过改革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在实现共同富裕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摘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 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张占斌 戚克维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艰辛探索中曲折前进

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变化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基本国情紧密结合，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扫清了实现我国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根本障碍。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变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提出了巨大挑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根据当时我国经济基础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针对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提出的正确论断，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探索的开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错误地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开展了激烈的批判，毛泽东特意要求在全会公报中加了一段话：“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我们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自此以后，理论导向上陆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政治实践上开展一个又一个“左”的错误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事实上也停止了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错误认知而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表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界定坚持了八大的正确思想，又解决了八大表述不够完善的问题。针对这个主要矛盾，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发展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

##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如果从1956年

算起已经 62 年了，如果从 1979 年算起，也有 39 年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历程中，我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同以往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调整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调整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原有社会主要矛盾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种创新侧重于“量变”和“程度”，注重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度”这个层面的提升，而不是在“质变”和“本源”产生的根本性变革，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为例：在“量”的积累上，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67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122 亿元，从 2010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以美元计算达到了 8826 美元，220 余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第一，多个重大科技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在整体上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不再是整体性的“落后”。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整体“质”的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性质没有变，在发展阶段上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基于以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必须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步伐，就要从经济总量扩张向经济结构优化转变来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这要求我们稳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沿着“五大路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不

断完善。

## 继往开来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本 遵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深刻指出了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充分、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依然很大，一些资源密集型、能源消耗型产业产能过剩，高精尖产业诸如机械、电子、军工产业在技术层面的发展受到制约，大量僵尸企业高负债、高库存、高风险运营，人均 GDP 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农村、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亟待加强，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主要民生领域的短板没有解决，在市场和政府、质量和数量、短期和长期、传统和创新、国内和国外这几个关乎经济发展的重大关系上没有形成统一高效的协调机制和有效定型的政策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立足于这些现实问题，既不能调高“胃口”，也不能降低预期。

经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回顾和反思，以及对新时代我国现实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思考，可以看出：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表述，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为逻辑起点，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对我国国情的基本现实进行深刻分析，为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现实依据、思想指南，明确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达到的预期目标。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设经得起人民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作者张占斌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威克维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生）

（摘自《理论探索》2018年第3期）

# 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认识

杨东方

关于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靠创新引领，创新引领的产业体系才能实现发展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是为完成同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效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关于市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标准是“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达到“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目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体系，才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机制。

关于收入分配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评判现代化收入分配体系，就是看这样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否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合理，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有助于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分配环节的内在要求。

关于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城乡区域发展关乎国民经济运行的健康、平稳和效率。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其前提是彰显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的优势，其过程是城乡区域发展协调联动，其目标是城乡融合发展，其表现是实现城乡区域良性互动，其手段是培育和发挥城乡区域比较优势，其

作用是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其重点是乡村振兴，其结果是塑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关于绿色发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绿色发展体系，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基本目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有力抓手，形成绿色价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绿色生活方式。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绿色发展。

关于全面开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逻辑：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建设全面开放体系的目的是提高效率，进而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建设全面开放体系的过程是实现多元平衡，更好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作为开放的重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使我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通过建设全面开放体系，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进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构建多赢的全球开放新局面。

关于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提升动力。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出发点，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有效为落脚点，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依据，检验经济体制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摘自《求知》2018年第6期，原题《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科学内涵的认识》）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免八个误区

陈文胜

## 强调政府主导而忽视农民主体地位

乡村振兴无疑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实践大多没有很好地在平等的基础上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层调研发现，知识分子来了要求农民这样，政府官员来了要求农民那样，却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要怎样。久而久之，就是政府主体、农民客体。因此，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坚持农民主体的原则，核心应是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重塑城乡关系，使乡村的发展进程不再为了服从工业和城市的需要而延缓，在城乡平等的原则下尊重乡村自主，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 简单地用工业化思路来发展农业

振兴乡村产业，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作为生态产业，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着显著区别。工业生产对象一般是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只要工艺相同，在任何地方生产的品质相同；而农业生产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什么样的地域生态环境决定着生产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马克思就认为，由于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着自然再生产的独特性，导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变化。工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即劳动，而农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而生产过程不一定是劳动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分配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因此，农业不仅要遵循与工业发展相同的经济规律，更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生命规律、自然规律。

## 照搬城镇化要求和理念建设乡村

乡村的形成是人与自然长期演变的结果，很

多乡村有千百年的历史。因此，乡村的发展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尊重生态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立足于乡村的特征，发挥各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农业的特色、文化和地理的特性，而不能把城镇化的理念简单照搬到乡村，忽视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历史上，凡是照搬城镇化理念推进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就会趋向恶化。

## 脱离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根本上是乡村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进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演变的进程，工农城乡关系变化是这一进程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引发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使乡村在整体上实现了由农业收入为主向非农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历史性变迁。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主要不是靠扶出来的，而是在外打工农民工和进城经商创业农民商人自我奋斗的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近三亿农民工置身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的全面脱贫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失去了巨大支撑。因此，不能离开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明确要求，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 以个案现象概括整个乡村发展状况

毫无疑问，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但如何

看待和评价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值得重视。正如陈锡文所指出的那样，“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破败的乡村、黑恶势力横行的乡村等现象，在一个村、一个地方是真实的，但只具有特殊性，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因而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差异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乡村，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单凭哪一个村、哪一个地方的单一现象或事件无疑难以定论，要从整体上观察中国乡村发展。

### 单纯以土地面积来评判农业规模经营

长期以来，在农业发展上基本认为土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没有土地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就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实上，今天中国农民的实践却打破了这个论断。由于科技创新发明了小型、微型农机，弥补了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自然条件缺陷，农民发明了社会化农机服务，普遍使小块土地实现了机械化，很多地方甚至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判断。北方的小麦生产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场，每个小农户都没有装备农业机械，但通过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统一施肥、统一收割，使用了美国那样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农业社会服务的规模化弥补了土地规模的不足，成为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农业的规模经营，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种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

### 战略短视损害乡土传统价值

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庶民百姓，乡情是一个永恒主题。无论

走到哪里，乡村地名都是每一个中国人回家路上最准确的坐标，代代相传的乡村地名是炎黄子孙的心灵港湾，每一个乡村地名是不可复制、不可断代的历史，承载着千百年的文化信息，是情感维系的标志性符号；祖坟则是寻根问祖的核心要素，每一座祖坟是一根连接家国的情感纽带，从而将祖源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为一体，使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归属，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反思“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高度关注不少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乡”等农村改革所带来的隐患，不能造成作为历史标记和历史记忆的乡名、村名消失，将家与国的归属纽带一刀两断，从而在国内断了国民的回家之路，在国外断了海外华侨同为炎黄子孙之根，使中国历史文化血脉走向断裂，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 对资本下乡妖魔化

现在有一种妖魔化资本下乡的论调，认为资本下乡存在“把农民搞得倾家荡产”“把农户利益席卷而去”的巨大风险。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恐惧资本下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关键是要加快清除阻碍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没有农村各种要素进城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同样，没有城市各种要素下乡就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此，对于农民的承包权或资格权与资本的经营权关系问题，不能以偏概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作者为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摘自2018年5月26日《湖南日报》）



# 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冯鹏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必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不仅构成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本质要求，而且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

## 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更好构筑中国精神，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基本指向。

第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首先必须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牢牢把握更好构筑中国精神的核心和根本。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最永恒而珍贵的精神成果，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时代精神是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类进步特征的最敏锐的反映，改革创新作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面向未来，当代中国需要推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更好构筑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国精神。

第二，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必须深入开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广阔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强

国实践中，只有坚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第三，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厚而坚韧的历史定力。

## 坚持以建设核心价值观为支撑 更好构筑中国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支撑更好构筑中国价值，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又一基本指向。

第一，更好构筑中国价值，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和重要稳定器。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现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

第二，更好构筑中国价值，需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根本价值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和践行者。人民需要核心价值观，也同时为核心价值观所引领和塑造。因此，在更好构筑中国价值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包括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和文化产品等在内的一切思想文化建设成果都能够充分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充分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正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立场所在。

第三，更好构筑中国价值，需要着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在文化上强大起来，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道德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在更好构筑中国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先进道德，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

第四，更好构筑中国价值，还需要为构建和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断贡献中国智慧。面对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和激烈竞争，推动全人类共同追求和共同实践以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抉择。

## 坚持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重点 更好构筑中国力量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

第一，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

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第二，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为人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上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功能，是更好构筑中国力量的重要依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始终保持阵地和导向不能丢的前提下，既大胆推进改革以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又把握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实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持续生成和充分释放。

第三，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努力创造反映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让中华民族既为人类贡献出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也为世界贡献出自己文化创新创造的优秀成果。

第四，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在传播“悠久文明”与“多彩文化”中加强文化认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生动的载体。

第五，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在“滴水穿石”“虚功实做”中涵养文化耐力和定力。更好构筑中国力量，既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因此，更好构筑中国力量，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在地方领导实践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坚持“滴水穿石”，推崇实干精神和锲而不舍的韧劲，又强化“虚功实做”，注重虚功与实功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涵养并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耐力和定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  
（摘自2018年6月15日《学习时报》）

# 从《尚书》中探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源形

吴灿新

## 协和万邦、天下一统观念

爱国主义的核心要义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发自内心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它以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耻。因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要求。

从《尚书》中我们发现，最早最显著的爱国主义意识是“协和万邦”与“天下一统”观念。它是华夏先民安居乐业理想与贵和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打开《尚书》，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段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对尧帝的一段评议美词，从这段美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尧帝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期，还没到真正的“国家”阶段，但已经有了“万邦”与“天下”观念，并追求“协和万邦”与“天下一统”的和谐局面。这种观念到了舜帝时期进一步明朗：“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而到了“三朝”时期，这种观念已经普遍化。在《尚书》的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如《五子之歌》篇：“明明我祖，万邦之君。”又如《武成》篇：“垂拱而天下治。”这些观念，无疑是现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中，强调国家独立安定统一，坚决反对动乱分裂的观念之源。

## 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意识

华夏先民很早就有着强烈的敬畏上天心理以及天人合一观念。在他们看来，天是万物之主宰，是天子君王合法性的最高最终根据。赏善罚恶，

弘扬正道。因此，有大德者才能成为天下君主，而君王一旦失德，就必定天命移位。这种心理与观念，在《尚书》的爱国主义思想中突出表现为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意识。

在《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禹之所以能君临天下，都根源于其德高望重。如尧“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尧帝在位70年时，向“四岳”征求接班人，“四岳”一致推举“克谐以孝”的虞舜，尧帝决定试用虞舜，结果“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于是尧帝禅位虞舜。后来，大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

在《尚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夏朝的灭亡还是商朝的灭亡，也同样是根源于其失德而作恶多端。一旦君王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上天就会剥夺其福命，有德者就应勇于担当，替天行道，除暴安民。《汤誓》记载，夏桀虐政淫荒，汤王起义讨伐，誓言天下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民意即天意的思想，天意是通过民意表达出来的，所以《尚书·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 忠君辅政、保民爱民思想

既然君王执政是天命使然，君王就是天子，国家是君王之国家，作为臣下者，忠君辅政就是

爱国之天理。这种思想，在《尚书》中也处处可见。当然，在尧舜的部落联盟时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君臣关系，此时在君臣关系中，主要强调的是君明臣贤，臣对君的贤良辅助。《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对众臣说：“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皋陶相也这样赞扬美好的君臣关系：“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而随着王朝的建立，国家的出现，相对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也出现了，反映这种关系的一个突出政德就是“忠”。《尚书·仲虺之诰》中言：“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这段话揭示了佑助贤德、显扬忠良的作用，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推求总结灭亡的道理以巩固自己的生存，国家就将昌盛。忠君爱国，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爱国必定忠君，逆君者就是叛国者。因此，忠君爱国则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道德，在《尚书》中有许多篇章对此大加赞赏：“惟忠惟孝。”“小大之臣，咸怀忠良。”

### 以国为重、克己奉公风貌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制度和世代承袭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主张个人利益、家庭（族）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正是在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光照下，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以国为重、克己奉公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从《尚书》中可见一斑。

《尚书》记载，大禹就是典型的以国为重、克己奉公的道德榜样。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因采用障水法治水而失败，历时9年未能平息洪水。于是其子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大禹以国事为重，“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娶涂山氏的女儿，结婚4天就去治水，后来启生下来呱呱地啼哭，禹顾不上照顾儿子，只忙于考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尚书》十分重视宣扬以国为重、克己奉公的美德。《尚书·太甲上》中载：“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怛，万世有辞。”先王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刻，就思考国事，坐着等待天明。又遍求俊彦的臣子，开导后人，不要忘记先祖的教导而自取灭亡。要慎行俭约的美德，怀着长久的计谋。好像虞人张开弓还要去查看箭尾是否符合法度以后，才发射一样；要重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遵行祖先的措施，这样千秋万世您将会得到美好的声誉。

### 以德治国、德主刑辅之道

在古代中国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中，在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在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中华民族开创了注重人伦的德治政治模式。这种德治政治模式，就是以德治国、德主刑辅之模式。

这种模式从《尚书·尧典》一开篇，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见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帝尧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不仅帝尧是以德治国的典范，而且其后继位的舜和禹也都是以德治国的典范。尧帝在禅位时，四岳先后推荐了尧帝之子丹朱和臣子共工，但由于丹朱“嚣讼”，共工“静言庸违，像恭滔天”，均不被起用。最后四岳推出虞舜，因其“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尧帝决定“我其试哉”。舜被起用后，“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舜慎重地赞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舜总理百官，百官都能承顺；迎接四方宾客，四方宾客都肃然起敬。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二级教授）

（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让诵读艺术扎根于广大民众

项建新

诵读艺术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文学特别是诗歌，是先有声音后有文字的，众所周知，诗歌最早的形式就是劳动号子，那么，声音与文字无疑是天然的一对。诵读作为一种有声阅读方式，是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全民阅读的有力实践者和推动者，更是国家文化生态体系的修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书香中国的建设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诵读艺术”呼之欲出！

“诵读”是现代诵读艺术的简称。它可以展示所有文本类型的有声语言艺术表达需求，坚持以文为本、走心至上，把文本用声音的方式有技巧、艺术、走心地表达出来，重在还原作品的意境。诵读既可高声诵读，亦可用中等音量诵读，也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因此，诵读艺术包括朗诵艺术。诵读艺术要加强对作者、作品的关切、研究，在服务于文本的基础上再展开有声语言艺术的二度创作，要把基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原理沿用于诵读艺术的创作，坚持“真实、真诚、真情、真声”的四真原则，摒弃“虚情假意、拿腔拿调、动作随意、脱离生活”的浮躁之风，以“适合文本需要、符合生活原理、坚持科学发声、致力打动人心”的有声语言样式来真正推动和丰富“现代诵读艺术”！

诵读的入门门槛很低，但是，要高度掌握这门艺术又有极高的难度。要推动“现代诵读艺术”，不可避免地要对从事“朗诵”数十年的朗诵艺术家、爱好者存在的根深蒂固又有明显局限性的认知进行科学的引领。

诵读之“易”，即指诵读的入门门槛很低，凡识字者，甚至会说话者即能诵读，勿论知识渊博程度，也勿论何种口音，只要走心，即可动人成诵。通常，人们会认为诵读须以普通话标准为先

决条件。但众所周知，1910年左右才有“国语”，1956年方有“普通话”，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并不是都在普通话的语境下创作出来的，很多古代诗文甚至用普通话根本读不出古体诗词应有的平仄等基本规律。因此，普通话标准与否不应成为诵读的先决条件。说诵读之“易”也就很容易理解。

诵读之“难”，是指诵读艺术的顶峰只有更高没有最高，诵读艺术亦符合艺无止境之原理。诵读确实可以理解为是有声语言艺术中最容易的门类，但也不能忽视诵读是有声语言艺术中最难掌握的门类，大家通常会认同唱歌比诵读难，唱戏比唱歌难，而更多的戏剧大师都认可唱戏中的“念白”是戏剧中的难中之难，而“念白”就属于诵读艺术的范畴。诵读之“难”可见一斑。

在当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文学界涌现出了大量的主旋律作品，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领袖的热爱等，也有对敌对势力的有力痛击、对丑恶现象的无情揭露等，这些主题都很适合用朗诵的形式来表达文本中或激昂或激愤的情绪。而反映风花雪月、小我情感的作品，在当时的环境下基本没有公开发表和表现的主流舞台。

诵读艺术，在当今社会环境下能让更多人的内心得到慰藉，作为一种轻型的高雅休闲方式，诵读焕发出了时代的使命，诵读可以有效地传播正能量、提高大家的文化素养，同时对全民阅读的促进、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让诵读艺术扎根于广大民众，努力推进全民诵读，积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实现作出贡献！

（摘自2018年6月20日《中国文化报》）

#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袁 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其中，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契合当今时代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实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前沿、把握发展大势、带领人民共创美好未来的具体体现，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力抓手。

树立社会治理智能化理念。首先，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智能化是顺应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改变甚至重塑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关联形态。其次，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智能化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现实需要。在智能互联技术日益普及和我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跨区域、跨行业、跨群体的社会治理需求层出不穷，网络虚拟空间治理水平急需规范提升等新挑战。最后，应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

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相关政府部门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提高其数字化服务水平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一是整合共享政务数据。全面整合条块分割的政务数据资源，突破政务数据的区域、部门和层级限制，建成对内一体化政务信息系统和对外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提升政务数据信息的整合覆盖、分级管理、统筹利用和互认共享水平。二是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拓展公共服务职能，扩大政务服务种类和覆盖面，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精准有效破解区域、城乡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难题。三是充分发挥法律、标准、示范等的规范引导作用。发挥法律规范、标准引领、示范带动在数据整合应用、平台接入、服务价值、应用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权责清单和服务指南，鼓励社会治理主体依法参与政务数据的开发利用，提升政务数据服务社会治理的综合效能。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载体和前沿，建设智慧城市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有效举措。一是加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水、电、能源、交通、管网等智能化基础设施，全面布局物联网、无线网等，使数据提取和移动交互更为便利，为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奠定基础。二是推动不同领域数据互联互通。促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构建覆盖城市运营各领域信息的“城市数据湖”，促进不同领域数据互联互通，提高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三是提高数据使用效率。深度融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深入挖掘“城市数据湖”海量实时更新数据和沉淀储备数据，提高城市治理者对大数据的研究应用能力和数据使用效率。

探索网络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目前，社会治理正向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应充分借助智能互联技术，探索实施“互联网+群众路线”治理模式，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扩大参与广度，拓展参与深度。一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宣传引导，既要掌握在线宣传引导的主动权，弘扬社会正能量；又要推动宣传力量下沉，在城乡社区基层组织进行线下配套制度建设和服务宣介。二是鼓励、引导和支持民间志愿者和社会团体依法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三是以网络为依托，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丰富群众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渠道，形成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强大合力。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摘自201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 排名不能覆盖大学全部发展目标

张端鸿

随着大学排名在全球的快速发展，高教界越来越感觉从年头到年尾似乎都成为了大学排名发布的“密集期”。仅仅在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排名包括：武书连 2018 中国大学排行榜、上海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校友会中国大学排行榜、英国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等数十个。这些排名在上半年发布，迎合了中国高三学生和家长择校的需要，其中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首次从下半年调整到上半年发布。

从现有的大学排名类型来看，发布的主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大学排名公司，二是商业性媒体，三是大学附属排名研究机构。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排名，都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属于典型的利益相关业务。从排名机构属性来看，众多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都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从排名的指标体系来看，各类大学排名都是“极简”的，从评估的科学性和完备性角度来说，这些过于简单的指标体系根本无从全面反映大学的全部。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大学在不同的大学排行榜上名次差别极大的原因。

为什么排名机构不选择更加科学而全面的指标体系呢？笔者跟全球四大排名的主要研发者都进行过交流，主要原因是商业成本控制，“科学”但“昂贵”永远不会成为排名机构的选择。从大学排名的利益相关角度来说，大学排名考虑的从来不是公共利益，“商业利益”和“政治正确”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事情。大学排名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性信息披露，其最大的价值是公共关系，而不是质量评价和绩效评价。大学领导者在意排名的结果，并非因为排名结果对大学具有多么重要的评价和诊断意义，而是因为排名结果在媒体上披露出来对学校形象的影响。一位大学排名负责

人告诉我：“你们高等教育学者对我们排名的所有批评，我们照单全收，但是我们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方法来改进；我们也不会因为你们的批评就放弃排名，因为大学排名不是排给专业人士看的，它只是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虽然大学排名有一定的信息含量，但如果公共部门轻易采信大学排名结果则可能会出现异常糟糕的误导效果。

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逆的，在全球范围和语境下探讨大学的发展坐标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有的商业性大学排名所披露的数据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全球的大学看到自己在某些侧面上跟其他标杆学校的差距，也能够若干年的对比当中看到自身的进步或者退步，这有助于大学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内地高校在若干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高歌猛进”，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内地高校人才队伍建设和普遍采用的科研激励政策，推动了高校在国际同行评价期刊发文数量和影响力的提升；二是内地高校科研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人员费比例不断提高，这一方面有效覆盖了科研成本，另一方面扩大了专职科研人员的规模，同时还优化了部分大学排名的竞争性科研基金指标；三是内地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融入全球学术大家庭，国际学术同行对内地高校的知晓度不断提高，以及部分世界大学排名的全球学术同行调查进一步加大了内地高校学者的问卷投放量；四是在中国内地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学生占比指标不断提高。我们的差距则主要体现在国际学术同行对我国内地高校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内地高校科研成果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师生比也亟待提高。

应该看到，大学排名不能覆盖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发展目标。由于大学排名对人才培养这一

# 保障和改善民生亟须高质量推进

唐莹瑞 王艳杰

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人民群众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问题。民生的内涵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当前，由于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老百姓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已经由过去的有饭吃、有学上、有房住等基本需求转化为要求收入稳步提升、医疗服务优质、教育公平、住房改善、环境优美和空气洁净等更多层次的需求。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要分析这些新变化、适应这些新变化，研究中国民生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事业发展模式，在社会事业的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社会也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和半封闭的传统型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累积的民生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区域居民之间存在过大收入差距。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335万左右。2017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虽然低于2008年0.491的峰值，但仍高于0.40的国际警戒线。从区域来看，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省份仅为最高省份的27.8%，差距仍然很大。在就业领域，由于人力资源过剩、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者生活成本和就业预期的提高造成“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就业难”主要表现在我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就业总量压力比较大。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年均仍有1500万人左右，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用机器替代人的方式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引起用工需求持续下降。“用工荒”是由于职业教育不足引起高技能劳动者短缺，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对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同时，受地区经济下

大学核心使命与功能的体现严重不足，大学过于追逐排名，可能会导致发展误入歧途，在不断追逐科研项目、国际发表和成果高引用率的同时忘记了育人的本质追求，从而陷入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校。如果忘记“为人民服务”，一些顶尖公办院校就可能因为盲目追求提高师生比指标，刻意削减招生人数，导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减少；如果忘记“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公办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盲目追求A&HCI和SSCI的指标

中，忘记大学作为独立智库的作用；如果忘记“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一些高校就可能为追求排名指标走向“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偏差；如果忘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一些高校就会在追求高引用率当中，错失为国家、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机会。大学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唯有回归大学之道，不忘初心和理想，大学才有未来。

（作者为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摘自2018年6月20日《中国教育报》）

行的影响，地区就业走势也呈分化态势，如传统产业占比较大的东北、山西等地区就业走势仍趋紧，而资源枯竭城市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教育领域，我国的教育资源也存在供给不足与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世界上衡量教育水平指标的基础线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2016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仅为4.2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在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落后地区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减少。我国教育领域还普遍存在教育需求者费用负担重的现象。在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难”是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从东、中西部比较来看，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相对稀缺；从城市与农村地区比较来看，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相对稀缺。“看病贵”是由医疗卫生费用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从国际比较来看，医疗卫生费用的配比应该为个人负担30%以下，国家和社会负担70%以上。我国医疗费用个人负担比虽然总体有所下降，但绝对数还在增加，这也造成了群众对看病贵问题反映比较强烈。在社会保障领域，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较快，但仍存在保障水平较低、覆盖面不广，进而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应对老龄化、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在住房方面，房价居高不下，人们买不起房是突出社会问题。我国的住房问题已经从一般性的住房短缺发展为高价住房的过度供给与经济性住房的严重不足并存的局面。住房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真实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程度，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新增人口、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

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民生问题的结构性矛盾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集中体现。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问题是由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社会资源、机会缺乏或配置不合理所引起的。而民生问题的解决无非从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入手。保障民生方面就是要对现有的经济资源和机会配置格局进行结构调整，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改善民生方面就是要通过产业调整、升级、教育培训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为民生提供更多经济资源和物质基础。民生工作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契合点是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社会事业的整体发展和全面关照。发展社会事业可以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高系统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

一是发展社会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一切民生、社会事业都要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展开。始终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二是发展社会事业要进行顶层设计。发展社会事业的顶层设计意味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社会事业发展的思路 and 方向，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建立多方参与的协调沟通机制。三是发展社会事业要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和关系。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和关系意味着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做到不失范、不越位；要发挥社会力量的支撑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避免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社会事业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安全阀”，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动机”。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社会事业的整体发展需要从理念到行动进行不断创新，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支撑。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摘自2018年5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



# 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不均衡”

张孝德

“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命运和发展方向最大的时代变量，也对中国未来理论探索与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从十九大提出的新矛盾、新时代、新思维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与实践、决策与落地、中央与地方、时代与创新等方面，存在的四个不均衡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 “不均衡”一：理论与实践的不均衡

党的十八大将十七大提出的“两型社会生态文明”上升为“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十八届五中全会再度将“五个文明”内化为“五个发展理念”。自从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密集出台文件。短短5年时间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维、新制度。但与此不匹配的是，围绕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较为滞后。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关系往往是，理论创新的节奏要快于政府的战略与政策出台，而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上，却出现了理论滞后于决策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许多媒体发表的文章以及个别专家学者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仍然停留在把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层次，而且这种认识在理论界与社会上占据较大比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针对解决环境问题而提出的，环境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绝不能把生态文明等于环境保护。如果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环境保护，十八大没有必要提出“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环境治理与保护，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我们今天遇到同样的环境问题，却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十九大报告中使用的两个关键词，

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说是基于中国智慧，提出的不同于西方的新环境治理之路。西方对环境治理的思维，属于西医式的头痛医头、脚疼治脚，治标不治本的不可持续的治理。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是基于系统辩证、五行生克的中国智慧，尝试把环境问题置入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系统中来解决的新探索。所以，不能把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环境保护。

二是学术界的分科思维、线性思维与“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需要系统整合、跨界创新的要求不匹配，由此形成了对生态文明内涵的解读，变成了盲人摸象，各执一端的乱象。哲学学者单纯从人与自然关系来定义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存在于古往今来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只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生态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环境科学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环境问题，顺着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科技进步和治理环境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学者认为，按照利益—行为—制度—激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基于新利益、新主体、新产权的市场制度的再设计。

总之，上述基于学科逻辑看，都有自己的自洽性。但是，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这些局限在传统学科思维的演进，离要科学地界定生态文明的内涵，还有很大差距。近代以来，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形成高度分科的大学教育和科研体系，无法适应生态文明时代，跨学科、非线性的复杂性研究，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所以，要根本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与理论、教育的不匹配问题，需要大力推动满足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的思

维方式变革以及教育与科研领域的改革。

## “不均衡”二：战略决策与内化落地的不均衡

战略决策与内化落地不均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已经完成顶层设计的生态文明制度尚未内化在主流的体制机制中。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文件不仅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很高的使命，同时就如何落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内化与落地的八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内容。这八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所有方面，也涉及到几乎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行政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体制都是服务于如何最有效学习追赶西方工业文明、搞工业化和市场化而形成的。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这条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大惯性的稳态体制。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一次重大的体制改革。因此，要将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顺利推行、不断产生卓越成效，还需要各方较长时间的调整和努力。

## “不均衡”三：中央与地方的不均衡

不可否认，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但是，从中央与地方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与重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央热，地方冷”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治理环境问题，从时代高度布局生态文明战略。但是，有不少地方对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远滞后于中央的要求。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单纯的城市绿化，看成是环境、林业等部门的事，而不是主抓的事。更为严重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在追求GDP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仍然以让环境为增长让步的思维来对待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要落地，必须扭转这种思维和认识。笔者调研发现，某地上级政府

对下级政府千分制绩效考核中，生态文明建设只有10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2015年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从河北省开始，到目前为止已覆盖全国31个省份。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对16个省份的6000余人问责。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开始真正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份量。

## “不均衡”四：时代挑战与自主自信不均衡

生态文明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理论界就已经提出，但是到目前为止，把生态文明战略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战略，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署第二十七次理事会就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的高度认可。

总之，十八大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方案的高度认可，充分说明了中国迈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在世界角色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中国正在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央，正在从追赶西方工业文明转型向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角色转变。

这个重大角色转变，需要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担当和自信、更大的创新能力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对这个新角色和新时代的挑战，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和主体性认知。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初步完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学习与追赶，但因此我们也形成了西化思维的倾向。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但在传统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理论研究，总是习惯先从西方世界找答案开始，理论与实践的自主创新精神不足。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摘自《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上）

#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杨永芳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当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现实意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形势作出了重大判断，明确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途径和任务。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目前，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现实警醒我们，只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才有未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前景才会光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生态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成效并不稳固。必须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让绿水青山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小康全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不仅引领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更是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天然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要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区域统筹、综合治理。“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当前，要建成一个生机盎然、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全面小康社会，必须着力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性、有效性。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干部奖惩提拔使用的依据。要建设一支本领高、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and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中心）

（摘自2018年6月8日《宁夏日报》）

# 适应新时代新挑战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祝灵君

## 群众组织力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基础

组织力是组织生命力的具体体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重视组织、善于增强组织力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带领群众、组织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要把党员、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深深根植于广大群众之中，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组织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

增强群众组织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单靠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甚至凝聚全人类的力量共同奋斗。首先，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并建立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行动。其次，还需要把农民和其他群众组织起来。相对于作为大工业产物的工人阶级，农民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更需要花大力气组织起来。

增强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国家山河破碎、主权沦丧、人民颠沛流离。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一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因此，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一切有理想、有信念、有正义感的政治组织神圣不可推卸的使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广大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关系，形成了党群关系同心圆。从此，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增强群众组织力是突出党的政治功能的迫切要求。列宁指出，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毛泽东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更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第一功能是政治功能。党只有深深扎根群众、紧密组织群众，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要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就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 新时代更需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组织变迁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挑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单位体制、户籍制度、档案制度等体制制度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单位体制逐步解体，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逐渐松绑，我国人口在地域范围内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性迅速增强。加入WTO以后，我国公民在全球范围和职业行业内的频繁流动已成常态。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固定职业者变成自由职业者，个体对组织的归属感不断减弱，原有的组织结构已被打破，而新的组织结构与规范尚未完全形成，这就成为我们党组织群众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挑战。

新媒体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当今中国，

受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因素的影响，已经进入“个体化社会”。社会的个体化体现出系列新的特征：家庭的社会功能弱化，就业短期化，在劳资之间劳动者的地位随着产业链的延长而弱化，经济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与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等等。社会个体化加速了基层社会“去组织化”趋势，迫切要求我们党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通过再嵌入方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

新社会阶层、新兴群体带来的挑战。伴随着新技术文明的崛起，当今中国，在各种新业态中出现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律师、中小企业主、经纪人、拍卖师、职业讲师等从业人员，这些新社会阶层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同时，一大批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活跃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网络空间、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中，四处传播各种信息与能量。

当前，面对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把握时代脉搏的敏感性不够强，做群众工作的理念落后、手段单一、方式陈旧，一些群团组织出现了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一些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缺乏感情，等等。这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战略选择

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既需要与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一体增强，又需要聚焦以下4个方面努力。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我们要用协商民主聚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用民主集中制把这些诉求集中起来，找到最大公约数；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以“看不见的手”延伸“看得见的手”，用利益联结机制把人民群众组织

起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贯通党治国理政“最后一公里”，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分散灵活办小事的效能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坚持保障向上提升、服务向下扎根，使其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最大限度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组织起来。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首先，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要严把政治标准，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培养优秀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大专职党务工作者配备力度。其次，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要运用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学”，在有条件的地方激活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发展功能，夯实文化功能，这样才能提升包括服务功能在内的整体功能，不断增强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引领力、号召力、领导力。最后，通过人、财、物等党建要素的再配置，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提升基层党组织覆盖率。

建立网上网下同心圆。我们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基层的各种要素、资源整合起来，统揽基层政权条、块职能，尽可能把群众自治组织、“两新”组织、驻区单位、志愿者等各种组织和力量统一起来。同时，构建数据统筹网，与基层治理的物理网格相重叠，形成“双空间”“双网格”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基层治理格局。

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党员干部要善于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通过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群众的信任与信赖，最终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上去；善于与群众谈心谈话，经常对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善于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做群众工作，在个性化手段、“微”服务方式上下足功夫。群众工作还要做进群众的家庭，高度重视家庭顾问、校外辅导员、职工之家“思想政委”的培养。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摘自《党建研究》2018年第6期）

# 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现实逻辑

代江波

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政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勘误纠错，从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和旺盛生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进行社会革命，有立有破，从而保证我国各项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自我革命是指革命主体对自身存在的问题采取自觉、自发、自动解决的行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自我革命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地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自我开刀的决心和魄力，坚决革除影响自身健康发展的弊端“毒瘤”，在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社会革命是指革命阶级为克服和解决旧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斗争行动，从而促使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指党领导人民以革命的形式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现新旧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更替，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继续彻底改造社会的所有活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神仙皇帝恩赐的，而是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取得的，是一系列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然结晶，是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继续。

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改造与伟大实践。

社会革命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社会矛盾，对组织开展社会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不同的新要求。这些新要求激励着领导者不断调整变革主观认识和行为模式，以便更好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更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确保实现好新的历史使命。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顺利推进的坚强保证。社会革命的发生不是自然而然的，社会革命的推进不是盲目无序的，它总是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引导下进行的。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革命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自我革命开展得好，开展得及时，就能及时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朝气，始终成为领导社会革命的主心骨和领路人。我们党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坚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相互影响，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只有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党全国一盘棋。因此，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必须牢固树立“四种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保持清醒头脑，保

持政治定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协同有序深入推进。

坚持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要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要有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清醒认识，必须驰而不息地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拼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必须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保持饱满的革命精神，必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革命精神融入自己的血脉，自觉做到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始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勇前进，在矛盾面前不绕道、问题面前不回避、困难面前不退缩，撸起袖子加油干，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进行到底。

坚持站在人民立场上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开展自我革命，还是开展社会革命，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人民，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就没有了价值归依，也没有了力量支撑。坚持人民立场，就要求我们在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实践中，注重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顺应人民意愿，不能关起门来搞革命，更不能打着人民的幌子，干着以权谋私、危害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要把防范党内出现利益集团、社会利益固化作为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让人民切实从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中得到

实惠，享受到发展成果，进而不断夯实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群众基础。

坚持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生存发展之道。解决问题，本身就是是一个改革求变的过程，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复杂问题现状的改变革新。过去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此，我们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坚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坚持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弊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格局。

坚持在完善体制机制保障中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要建立健全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积极搭建协同推进的工作平台，有效解决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张皮”的问题，自觉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同步落实，不断拓展二者协同推进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创新二者协同推进的方法方略，不断强化二者协同推进的实效成效，努力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协同推进体制机制体系。一方面，要结合社会革命推进自我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激发广大党员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要结合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为社会革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领导力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摘自《前进》2018年第6期）

# 党员干部“体验式”调研的原则、方法与关键

王志航

“体验式”调研与“走秀式”调研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目的和方法两方面。体验式调研旨在置身其中，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以“角色带入”的方式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感同身受”的真实体验寻求解决人民群众急难问题的根本方法。从方法上讲，“体验式”调研以问题为导向，要求党员干部放下“官架子”，少讲话多学习、少指导多体会，以强烈的代入感消除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行政地位差别，切实认清群众所关心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体验式”调研通过“走进去”的方式，将人民群众切身关心的问题“带出来”，这“一进一出”之间，让党员干部赢得了民心、凝聚了民意、抓住了真问题、得到了真反馈，实现了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体验式”调研作为重要的调研方法之一，既遵循一般调研的基本原则，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一般角度而言，调研需要具备“深、实、细、准、效”五大要素。“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以深入调研取代“走过场”式调研；“实”就是谋事要实、作风要实，轻车从简，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就是要深入分析问题，积极听取多方意见，全面掌握各种情况；“准”就是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问题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规律；“效”就是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做到出实招、见实效。除了一般调研应具备的五大基本要素外，“体验式”调研还具有“简”和“快”两大特点。“简”就是指简单易行、操作方便，不需要过多的调研手段和调研工具，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直击问题；“快”就是发现问题快，调研问题的轻重缓急一目了然，避免了层层汇报的时间滞后、信息错位问题，阻绝了部分地区“报喜不报忧”、欲盖弥彰、大事化小等掩盖手

段，以最迅捷方式获得真情况，解决真问题。

“体验式”调研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微服私访、体验民情，它具有一整套系统的调研步骤和调研方法。前期准备、后期总结论证与实地调研工作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调研体系。调研前期需要召开相关负责人、专家的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征询专家意见，对问题和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专业化理解，避免“体验式”调研变成漫无目的的“体验生活”。前期准备的目的是确定问题方向、对基本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增强对调研问题理解的针对性、专业性。实地调研过程是“体验式”调研的关键，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亲自体验法”，即“调研主体完全以一个普通人身份，直接深入群众生活的某些领域亲自体验的过程”。“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体验式”调研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进行一次自身定位的转换，走出庙堂，走到基层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关注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治理精细化、家门口服务常态化等一系列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下，领导干部直观的体验远比在会上听取汇报、看基层的工作概要来得更真实、更准确。同时，这种切身之“难”的体验，也会成为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重要推动力，激发其责任感、促使其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地调研后形成的认识往往是直观的、分散的，具有更多感性认识的特征。为了对调研情况和问题进行更好的规律性总结，直观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客观的理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调研结束后的总结论证就显得尤为重要。总结论证需要集思广益、运用现代的科学分析手段谋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手段与正确方法。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党校）

（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6月号）



## 台风缘何此时频频光顾

“艾云尼”刚走，“马力斯”来了。6月12日上午，随着“马力斯”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当天上午8点钟对其停止编号。

下一个来的又会是谁呢？印象中，每到夏秋季节，台风在我国沿海城市都会一个接着一个，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看到此，有人不禁会问，台风缘何多集中在这个时间爆发，台风预报是怎样完成的，难度何在？

### 季风和副热带高压 致使夏季台风偏多

通常我们所说的台风，在气象上叫做热带气旋，是指发生在热带或者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

热带气旋根据强度不同，由弱到强，可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级、强热带风暴级、台风级、强台风级和超强台风级6个等级。台风是指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的热带气旋。

“影响我国的台风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和南海，其活跃期是6月到11月，但生成最多的主要集中在7月到10月。”12日，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张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玲介绍，台风是由活跃的热带对流经组织化以后形成的逆时针旋转的涡旋，一般来讲，南海季风平均爆发在5月中下旬，之后向南海和西太平洋输送大量的水汽和能量，构成台风最主要的水汽和能量来源之一，同时，夏季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还受副热带高压系统的控制。这样，季风条件比较好，并且副热带高压也比较强，就有利于热带对流的发展，从而形成有组织的逆时针旋转涡旋的频率就更高些。

“其实，从历史上看，全年都有台风的生成，只是在冬季台风生成的数会比较少。”张玲说。

象辑科技气象技术专家欧波也表示，从台风活动上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生成。在气象学上，台风是一个典型的中尺度气旋系统，它多生在低纬度高温高湿的海域，生命史一般从几天到十几天。

“影响台风活动路径的最主要天气系统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台风的移动经常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引导气流作用下，分为西向、西北向和偏北转向三种路径影响我国和东亚沿海各个国家。”欧波说，此外，南海也是台风生成和发展的一个源地，南海台风还具有生成发展快、移动路径复杂、预报难度大等特点，这次的“艾云尼”就充分诠释了这样的特点。

此前，“艾云尼”移动路径反复变化，曾三次在我国登陆，这在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 影响因素复杂 准确预报如解谜题

台风如此无常，气象人员又是如何做到准确预报的呢？

欧波表示，目前台风预报的主要方法是以数值天气预报为基础的客观预报方法。数值预报技术是把大气模拟成一个复杂的闭合方程组，通过赋予初值和给定边界条件，利用超级计算机来计算大气状态的方法。

“简单来说，台风预报，如同其他的天气预报一样，就像是在解一道非常复杂的数学题。”张玲说。

张玲介绍，数值预报方法是把大气和台风运动，用一组大气运动方程组描述出来，预报人员把观测到的气压、风、温度、湿度等作为方程组的一些已知条件，而天气系统的变化（包括台风的运动、强度的变化等等）就是方程的未知数，这个方程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在实际求解时还需适当简化。用超级计算机算出结果之后，预报

员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数值预报结果进行订正，得出最终的预报结论。

台风路径预报是台风预报中很重要的一点。张玲告诉记者，预报员判断台风走向考虑最主要的因素是大尺度天气系统对台风的引导作用，通常称其为引导气流。

引导气流的大小、强度和方向是决定台风路径最主要的因素。每个台风都不尽相同，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实际预报中，台风引导气流通常是由一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海季风、冷空气等，甚至有时南半球的天气系统也会影响北半球台风的行进路径。如2010年13号台风“鲑鱼”，其从西太平洋进入南海之后，出现了近90°的北翘，就与南半球冷空气爆发有很大的关系。

张玲表示，台风是一个立体的柱体，不同高度上环境大气对台风的影响力大小和方向可能都不一样。“就如一个人站在那儿，一个人在上面向一个方向拉他的胳膊，同时另一个人在下面往另外一个方向拉他的腿，此时这个人往哪个方向走，就比较难说了，预报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台风的主要引导气流来自哪个方向，还有就是大多数台风的结构都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也会对台风运动路径产生影响。”

## 有了风云卫星 我国预报能力进步快

台风预报难，究竟难在哪儿？欧波表示，由



于台风的生消发展和移动变化多与海洋有关，且活动区域又大都在远海，气象观测手段不像陆地上那么多样，实况来源少、信息量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台风的预报能力。

“与西太平洋台风相比，南海台风就相对难报一些。”张玲说，这是因为在南海生成的台风一般强度相对较弱、生命史也比较短，主要是因为南海及周边海域生成的台风距离陆地较近，此类台风还没能发展到很强就碰到沿海和陆地了，台风受到下垫面地形摩擦作用后，其强度往往会较快地减弱。

另外，南海台风往往高低层引导系统不同，导致台风结构不对称。一般情况下，南海台风中高层位于南亚高压的南侧，盛行东北风，而低层受南海季风影响，盛行西南季风，高低层引导系统不同，台风结构往往不对称，所以不容易发展到很强，加之周围环境引导系统比较弱，所以也不太好把握它的走向，而且南海台风往往生成不久就登陆了，留给预报员的反应时间也有限，所以情况比较复杂，相对难预报。

欣喜的是，在欧波看来，这些年随着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的业务化应用越来越深入，特别是新一代风云四号A星也已经在2016年发射成功，陆续还会有新的气象卫星投入业务使用，这些卫星将提供分辨率更高、时效性更强的观测资料，为台风的定位、定强以及预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手段支撑。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随着我国自主研发数值预报系统的不断改进以及立体探测手段的不断丰富，我国的台风预报能力进步很快。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24小时台风路径数值预报误差，已经由2003年的145公里逐渐减小到2016年的66公里。“就台风路径预报能力来讲，我国现在的预报水平已处于国际先进行列，一点儿都不比美国、日本差。”张玲说。

(记者 付丽丽)

(摘自2018年6月14日《科技日报》)

# 燕窝的“营养”不值得追捧

王 佳

自古以来，燕窝就作为一种养颜佳品受到追捧，现在普通人想吃上一顿也非难事。问题是，燕窝的营养价值真的跟它的名气一样高吗？

## 蛋白质比不上牛奶鸡蛋

燕窝中的蛋白质含量为 52% 至 63%、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25% 至 27%、脂肪含量为 0.14% 至 0.28%、铁含量为 5%，其他矿物质、纤维素和维生素含量则很少。

从营养成分的角度分析，燕窝的营养价值并不高。燕窝中的蛋白质主要由组氨酸、精氨酸、胱氨酸、色氨酸和酪氨酸组成，其中只有色氨酸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必需氨基酸是指在人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能满足人体需要，须由食物蛋白质供给的氨基酸。评价蛋白质的好坏，是看它是否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是否对人体健康好处更大。一般认为，所含必需氨基酸种类越多，这种蛋白质就越好。因为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是为了满足对氨基酸的需要，当一种蛋白质所含有的人体必需氨基酸丰富时，这种蛋白质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进而合成人体的蛋白，维持正常生理活动，比如维持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和维持肌肉含量等。

虽然燕窝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但必需氨基酸只有一种，其他氨基酸种类均非人体所必需。从这一点来说，燕窝的蛋白质反而不如鸡蛋和牛奶“优质”。鸡蛋的蛋白质中富含人体所需的 8 种必需氨基酸，牛奶的蛋白质中也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与燕窝的蛋白质相比，高下立现。客观看，燕窝中蛋白质的数量还是挺高的。只是从健康饮食角度而言，人们不可能天天吃、顿顿吃，燕窝对人体的益处也就微不足道了。

此外，燕窝中的碳水化合物对于并不缺乏营养的人来说也没有营养学意义。二两燕窝大约能提供 345 千卡能量，相当于二两面包，对于因为某些疾病需要控制饮食的人群来说，不宜作为日常饮食的额外补充。燕窝中的铁和矿物质含量比较高，但它们是无机物，人体对它们吸收甚少或者根本不能吸收，其营养价值也可以忽略。

## 是否富含“表皮生长因子”不确定

燕窝之所以受到追捧，是据称它含有一种表皮生长因子，能加速细胞分裂，促进表皮生长，使皮肤变得光滑而有弹性。

实际上，燕窝里到底是否真的含有丰富的表皮生长因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科学研究证明。表皮生长因子是一种小分子蛋白质，它对调节细胞生长、增殖和分化有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要求整个分子到达细胞表面，并且保持着天然的空间结构才能实现。

即使燕窝中富含表皮生长因子，但在烹饪过程中它们会失去空间结构，进入人体消化系统后，在消化液的作用下会再一次分解而失去活性。也就是说，燕窝中的表皮生长因子根本没有机会以整个分子的形式到达人体的细胞表面，也就不能真正发挥美容养颜的作用了。

另外，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证明燕窝提取液可以与流感病毒等病原体结合，从而保护细胞不受病毒侵害。但这类研究不足以证明燕窝在作为食物时也有相应作用，因为体外试验的作用机制与人的消化过程完全不同，而人对病毒的抵抗机制在体内也完全不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判定燕窝能保护人体不受病毒感染。

## 吃得多激素会不会超标

有一些观点质疑燕窝中含有激素，吃了对身

体有坏处，这种想法倒是多虑了。

激素是由特定细胞分泌的对靶细胞的物质代谢或生理功能起调控作用的一类微量有机分子，它对机体的代谢、生长、发育、繁殖、性别和性活动等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任何生物的正常生命行为，都离不开适量的激素。

严格来讲，每日三餐的肉食里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微量的动物激素。燕窝是金丝燕在孵卵前由雄雌金丝燕共同吐筑的，据此可以分析，燕窝中不太可能含有性激素，至少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导致性早熟的雌性激素。从生理角度分析，即便燕窝中含有某种激素，这种激素也是含量极微的内源激素，考虑到金丝燕的体重以及金丝燕的卵生特性，其激素含量水平可以忽略不计。

但要留意燕窝漂白的问题。如果把燕窝泡在水里，取出燕窝后在水里滴入碘化钾，变成蓝色就表示进行过漂白处理。食用漂白后的燕窝对人体有害，如可能致癌、破坏生育功能、引起重金属中毒和肠道疾病等。

### 三类人群不宜吃燕窝

燕窝对美容养颜、预防病毒感染等方面没有特别的功效，但从中医角度讲，燕窝具有养阴润燥，治虚损、咳痰喘、咯血、久痢的作用，是适宜体质虚弱、营养不良者食用的。但是，我们不推荐健康人群为了所谓的“营养”“美颜”经常食用燕窝。

要注意，有三类人不适宜吃燕窝。一是不满6个月的婴儿，由于燕窝中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不理想，非必需氨基酸过多，非但不能对婴儿体内的蛋白质合成产生有益效果，反而可能对其肝肾功能造成损伤。二是感冒尤其是发热的患者不宜吃燕窝，因为这时身体消化系统功能下降，患者进食了燕窝却不能消化吸收大量蛋白质，易致消化不良。若患者仅是咳嗽，没有其他感冒症状，是可以食用燕窝的，因为燕窝性平味甘，可滋阴养肺。三是对蛋白质食品有过敏反应的过敏体质

者慎吃。燕窝是一种高蛋白食物，同时其中还残留一些动物的绒毛，这些都是过敏原。即使过敏原不是燕窝，若人体正处于过敏症状发作期时，也建议尽量不吃燕窝。

无论如何，燕窝绝对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进食过量或在本来已经很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基础上再过分补充燕窝，会导致蛋白质摄入过剩。身体对蛋白质的分解增加后，由尿排出的含氮物质也会增多，从而加重肾脏的负担，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 · 延伸阅读 ·

## 燕窝是怎么形成的

燕窝是雨燕科金丝燕属的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的燕类，吞食海中小鱼或其它蚕螺海藻等小生物消化后，分泌出的胃液与其绒羽混合凝结而筑成的巢穴，多发现于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或岩洞之中。巢穴呈半月形，形状好似人的耳朵，基底厚，廓壁薄，重约10克至15克。巢穴外围整齐，内部粗糙，形似丝瓜网络。

燕窝主产于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日本等地以及我国的福建、广东沿海地带。因采集时间不同，燕窝可分为宫燕、毛燕、血燕；按颜色又可分为白燕、黄燕等。

金丝燕第一次筑的窝，纯粹用唾液堆积凝集而成，色洁白，相对其他燕窝品质较好，称为白燕，因古代曾列为贡品，故又称为宫燕。血燕则以颜色鲜红、矿物质等营养素丰富、产量稀少被追捧为燕窝中的珍品。血燕的形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金丝燕吐血筑成，还有一种说法是岩洞中的矿物质渗透进燕窝经过长期氧化而形成。专家认为血燕的形成需要各方面条件的契合，存在极大的偶然性，因此从价值上来说最为稀有。

(作者为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  
(摘自2018年6月15日《北京日报》)

## 我国首次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

记者26日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向各地派出32个检查组，对31个省（区、市）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此次实地核查是地方自查自评、专家网上评估、第三方监测和满意度调查等一系列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的重要环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

据悉，此次核查的内容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统筹推进教育工作情况，加强教育保障情况，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等6个方面、38项测评内容、92个测评点。核查将采取召开政府见面会，查验档案资料，核查相应省级责任部门，抽查有关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学校，开展随机访谈等形式进行。

（记者 张烁）

（摘自2018年6月27日〈人民网〉）

## 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6.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6/10万，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专家指出，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卫生健康部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取得阶段性成效，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逐步提升，生育服务管理、中医药等工作得到加强，综合监督水平不断提升。

公报显示，2017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政策全面跟进。截至2017年底，93.9%的城市公立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与上年相比，医院次均门诊药费下降1.8%，占比下降2.8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下降7.1%，占比下降2.5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通过培养全科医生、推动家庭医生签约等逐步增强基层服务能力。201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达44.3亿人次，比上年增加0.6亿人次。其中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占门诊总量的23.0%，所占比重比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

（记者 王宾 田晓航）

（摘自2018年6月14日〈新华网〉）

## 国企工资改革2019年将全面实施

国企工资改革将在明年全面实施。据悉，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召开贯彻落实《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电视电话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定配套政策，推进改革顺利进行，确保明年全面实施。强化督促指导，注意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此前表示，根据相关要求，国资委将在2018年适时出台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配套研究制定实施细则等操作性文件。各中央企业要按照国资委统一部署，认真梳理本企业制度建设、流程规范、责任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尽快完善相关办法，编制申报年度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实施落地。

在此基础上，国资委今年将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的监督指导，其中包括，各

中央企业要牢牢盯住市场化薪酬分配这个“风向标”，建立健全以岗位价值为基础、以绩效贡献为依据的薪酬管理制度，坚持以岗定薪、岗变薪变，调整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做到收入能增能减。

(摘自2018年6月12日《经济参考报》)

##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加速提升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为218.3（以2010年为100），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高增速。在世界上40个科技资源投入和知识产权产出较大的国家中，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排名从2012年的第19位提升至2016年的第10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与知识产权强国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加速提升，创造指数由2010年的100提高到2017年的216.5。”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表示，2017年各类主要类型知识产权申请、登记、注册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结构进一步优化。相比2016年，创造效率各项指标提升幅度也较为明显。

作为《报告》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我国专利质量近年来稳步提升。2017年，全国专利维持率达到60.0%，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达到6.2年，较2016年提高0.3年。但从数量、质量与效率3个二级指标对知识产权创造这个一级指标的贡献度来看，我国知识产权质量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数量和效率。“未来，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应进一步向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倾斜。”韩秀成说。

《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水平稳中有升，保护指数达232.9，比上年提高16.3个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全面从严大保护的格局初步建立。”韩秀成分析说，该指数在

2012年后超过200，代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上了一个新台阶，2013年至2017年，保护发展指数整体表现为平稳上升的态势。

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量为6.7万件，商标行政执法办案量为3.01万件；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1.91万批次，涉及侵权货物4094万余件。

(记者 李芃达)

(摘自2018年6月13日《经济日报》)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日消息，经党中央批准，根据党章党规和宪法、监察法有关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名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对驻在部门新设或更名的，派驻机构名称作相应变更。派驻纪检监察组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

据了解，2014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明确通过新设、调整等方式，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2015年3月，中央纪委首次向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2015年1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方案》，明确中央纪委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此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并相应变更名称，是根据党章党规和法律有关规定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体现。

(摘自2018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扩大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遵循农村改革“扩面、提速、集成”总体要求，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吉林、江苏、山东3个省，河北省石家庄等50个地级市、天津市武清区等150个县（市、区）为2018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扩大试点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路径。2016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先行试点，逐步推开。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已经组织了第三批试点。第一批试点是，2015年农业部、中央农办、国家林业局确定在29个县（市、区）开展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这项改革试点任务去年年底已经完成。第二批试点是，2017年农业部、中央农办确定在100个县开展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周期两年，将于今年10月底完成。第三批试点是，今年进一步扩面的改革试点，包括吉林、江苏、山东3省全省开展试点，50个地级市开展整市试点，150个县级行政单位开展整县试点。三批试点加起来，共涉及县级行政单位1000个左右。此外，部分省份还确定了266个省级试点县。

(记者 高云才)

(摘自2018年6月20日《人民网》)

## 5G 全球统一标准出炉

6月14日，3GPP全会(TSG#80)批准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5G NR)独立组网功能冻结。加之去年12月完成的非独立组网NR标准，

5G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作，进入了产业全面冲刺新阶段。

5G独立组网可以降低对现有4G网络的依赖性，更好地支持5G大带宽、低时延和大连接等各类业务，并可根据场景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各类用户的业务需求，大力提升客户体验。

根据工信部的方案，我国的5G承载频段是Sub6GHz的中频，也涵盖在此次标准范围内。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正式宣布规划3300-3600MHz、4800-5000MHz频段作为5G系统的工作频段，其中3300-3400MHz频段原则上限室内使用。

在此次5G独立组网标准形成中，中国无疑成为了重要贡献者。以中国移动为例，中国移动研究院的众多专家成为了5G标准工作组的主席、报告人及重要贡献者。在独立组网标准形成过程中，中国移动在3GPP担任了下一代网络架构(5G)研究、5G系统架构标准的项目负责人工作。在全球产业界的大力支持下，历时两年半牵头完成了5G新核心网5GC的从研究到标准化的艰巨工作。

(记者 石飞月)

(摘自2018年6月15日《北京商报》)

## 流量漫游费7月1日起取消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22日先后宣布，自7月1日起取消流量“漫游”费，手机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近15亿户，同比增长10%，4G用户总数达到10.9亿户，占比达73%。其中，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达12.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82.3%。1月至5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10亿GB，同比增长196.3%；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达到206亿GB，同比增长212.3%，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8.1%。

(记者 黄鑫)

(摘自2018年6月23日《经济日报》)

## 马克思的早年岁月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特里尔，一座位于德国境内靠近卢森堡边界处的安静小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特里尔被拿破仑占领，直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拿破仑战败，才从法国脱离成为普鲁士的领地。当时，普鲁士正在与奥地利争夺德联邦38个小国的统治权。

从童年时期到大学第一年，在马克思的人生中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然而，从那以后，马克思在欧洲思想和政治运动发展中占据了独特而中心的位置。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持续影响并塑造着今天的世界。他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推翻它。时至今日，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他的追随者已经使世界发生巨变。

1983年，马克思去世100年后，宣称遵循他的哲学思想的政府统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六年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国家纷纷发生动荡，共产主义政府被推翻。随后，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的20年，马克思的思想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信，资本主义一枝独秀。然而，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萧条重燃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的确，人类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马克思当时试图解决的那些。相比马克思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更加不平等，更加不可思议，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占有的财富比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

本书并非关于马克思的学术研究，亦非对他人生的综述，而是他的生平概略。目的是带读者领略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因此，每一部分都附有当时场景的版画。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中产阶级律师，受过教育，思想开明，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路德派教会。他的这一决定也是出于实际考虑，当时普鲁士当局出台

法律，禁止犹太教活动。亨利希将基督教奉为他的人生和道德指南。他深爱妻子和孩子，尤其喜爱卡尔，同时对现代进步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

亨利希和当地的显要人士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朋友。男爵注意到马克思的求知欲和强大的理解能力，因此亲自指导他。男爵经常带马克思进行长时间的散步，与他探讨思想观点，给他背诵名家作品。然而，不久，马克思发现他更加愿意与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在一起。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受过良好的教育，睿智、美丽并且拥护激进的政治观点。马克思非常仰慕她。青梅竹马的两个人在1836年秘密订婚了。燕妮是一位受欢迎的女士，马克思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她的芳心。年龄上的差距、马克思较低的社会地位和犹太家庭背景，对他都构成了障碍。马克思的父母先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支持他们结婚，但燕妮的父母是几年之后才知道的。

自1843年结婚开始，马克思和燕妮携手度过一生，他们之间的爱经受住了困苦、疾病、灾难、绝望等最严酷的考验。今天，马克思和燕妮都埋葬在海格特公墓，仅几英尺的距离，无论生死，他们都在一起。

马克思早年时期未有学术成就，他就读于特里尔中学——今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当时学校思想进步的校长鼓励学生们大胆想象自己的未来。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章及在波恩大学第一年的学术表现并未显示出他的天赋，他当时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表现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摆脱了童年和家庭环境的羁绊。

马克思加入了大学里的饮酒兄弟会和击剑俱乐部，这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只偶尔才给他的家人和燕妮写信。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告诫他不要显得这么冷漠，特别



是在同燕妮的关系上。每当他写信回去的时候，他的父亲都对儿子的自信和能力表示欣赏和尊重，但也从中感受到他过度的自我意识，因此想在这方面磨炼他。事后证明，父母对马克思生活方式的担心显示出他们非常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但马克思忽略了他们的建议，他的生活和健康也因此饱受折磨。

在1835年11月给马克思的信中，亨利希写道：“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封信中，他的母亲让他生活上注意节约，“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小家务的，这一点你不应当看成是我们女人的弱点。节省不论是在大小家务中都是项重要的事情。”

这一时期，马克思成为一位诗人，他的父亲鼓励他多写文章，并多和对自己前途职业有帮助的人交往。1836年，父亲对马克思不知节俭的习惯表示忧虑，斥责了他的严重超支行为，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儿子没有足够的钱花，会为了钱做不体面的事，他在信中写道：“但愿你用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钱”。

马克思叛逆、激进的生活很快结束了。他的父亲坚持要他转到柏林去上大学，远离他那些不三不四的兄弟会伙伴们，培养更加严肃的友谊和社交关系。

1836年10月，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学习。他的父母很担心他的健康，警告他要少吸烟少饮酒。因此，当马克思提及他对决斗的偏好时，他父亲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但仍试图有理有据地说服他。他父亲在信中写道：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有密切关系吗？……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根。否则，你终究会使你自己和你父母最美好的愿望遭到毁灭的。”

但每一次亨利希责备儿子的同时，总是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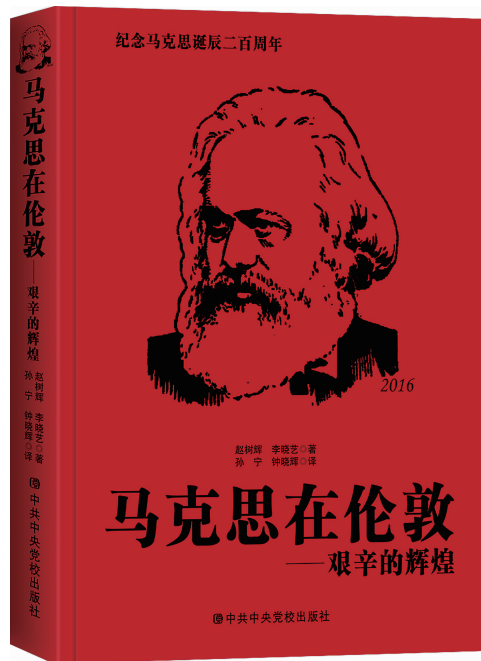
感到需要表扬他。亨利希在1836年11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上帝恩赐，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

这封信的末尾写道：“又及：亲爱的卡尔，要是你的字迹写得清楚一点，那就好了。”潦草的字迹已经成为马克思长久以来的一个特质。后来，因字迹难以辨认，他在申请帕丁顿火车站一个无足轻重的办事员职位时，遭到拒绝。他去世后，解密他的花体字，成为一门艺术，只有很少人才能掌握。

亨利希建议马克思通过写作出人头地。他在1837年3月2日的信中写道：

“题材应当取自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并且不要像长篇史诗所要求的那样选取很长时间，而是选取一个较短但却对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

马克思在后来的人生中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诸多时期的历史，但他的父亲建议他在文章中歌颂普鲁士皇帝和政权，很显然，马克思并没有这么做。



(摘自《马克思在伦敦——艰辛的辉煌》，赵树辉、李晓艺著，孙宁、钟晓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6月版)



# 胡同里的乡愁

李予阳

初夏，伴着浓荫中响亮的蛙鸣，去访问老舍故居。这里也是老舍纪念馆，是北京市人民政府1987年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

老舍先生的家在一条胡同里——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老舍在北京解放前后住过的地方共有10处，其中解放前9处，解放后1处。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就买了丰富胡同的这座四合院，直至辞世。老舍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长达16年。

这里闹中取静，离王府井商业街和著名的东安市场不远。灰色的院墙普普通通，从外面看不出这里曾生活过一位著名作家。走进门，迎面是一面影壁，上面是老舍的夫人胡絮青手书的“福”字。小院不大，很幽静，没有熙来攘往的游客。但是我心目中老舍的家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像老舍的为人、老舍的作品，平实、朴素。

老舍出身穷苦人家，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并不识字，但性格隐忍坚强，是对老舍影响最大的人。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时曾担任过今天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在业余时间到西单的缸瓦市教堂学习英文，后来还到英国教授汉语。这些经历都融入他的作品。

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塑造了骆驼祥子、祁老太爷等不朽的人物形象。他赢得了大家的衷心喜爱，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是对于文学，他永远保持着谦卑的态度。故居墙上，挂着老舍1938年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的入会誓词，誓词朴实无华，真切动人——“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

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阳光明媚。院中的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和夫人一起种下的，老舍的夫人把这个小院子称为“丹柿小院”。柿子树长得十分茂盛，倾泻下一片绿荫。可以想见深秋柿子红时，老舍和夫人在树下静静欣赏那些美丽的小灯笼，该是怎样温馨的一幅画。

老舍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6年。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以及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旗下》等24部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老舍是我喜爱和敬重的作家。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也写了一辈子北京。他爱北京，爱平民生活。他倾注感情写普通人，车夫、巡警、糊棚匠……他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同他们一起欢笑、流泪。老舍的作品总是那样情真意切，朴实无华。他用老百姓的语言，写出京味十足的北京生活。

走出老舍故居，漫步在他所居住过的胡同里，看胡同人家种的丝瓜、梅豆，门上贴的门神、对联，听街坊四邻的彼此寒暄，恍惚走进老舍笔下那个自然清新、人情温暖、生活方便、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感到自在安适的老北京。我竟然起了乡愁，对于传统生活的乡愁。

想念老舍，想念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东西。